

中蘇友誼
蘇聯友誼

中蘇友誼
蘇聯友誼



文學散論

高爾基著
孟昌譯

文獻出版社印行



鴻洪普

源人

玩

天

8792
643-58,
2

慶祝你，喬治
們先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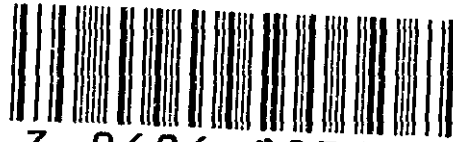
二之書叢譯翻

論散學文

著基爾高

譯昌孟

尖口為
瓦子
年
月
日



3 0606 0936 3

行發社版出獻文


月一十年十三國民華中

A510092



目 錄

論偉大作家與「青年作家」	一
論青年作家	七
再論文字通順	二一
培養文化技師	二五
論能力的浪費	三五
文化的突擊隊員	三九
論工作的不熟練，疏忽，不忠實等等	四五
論不負責的人們並論今日的兒童讀物	六三
1 關於一個論戰	七五

卷

一九四〇年七月廿日

論語言

八三

把文學——給與兒童

九二

關於故事

九七

論樹與點

一一一

後記

一二三

論偉大作家和「青年作家」

我熱誠地感謝一切祝賀我的人們：工人，老布爾什維克同志，康姆黨員，文學家，學者，工藝員，信員和其他的人們。在心靈上，在工作上，他們溫暖了我。想用特別和非常的辭令來感謝初學者們，然而這些辭令我不能說出來。簡單說吧：謝謝！謝謝！孩子們，謝謝！我知道，從你們當中將成長許多比我重要的人。

我近來接到二百件以上的電報和同樣多的信件。這是很多的了，這，當然出乎我的意料。值得驕傲的是，勞動大眾，康姆黨員和蘇維埃知識分子對我的工作都認為有益。這是「返老還童。」有些祝賀者稱我「偉大」。毫無疑問地，這是誠懇的，但必須說，這是多餘的辭令。我完全是個平常樣子的人，也感不到我的模型裏有什麼偉大。我可以自認是個不壞的工作者，因為我喜歡自己的種種工作。然而有不少我這樣的人，許多這樣的成人就須做種種工作。工作的品級我是用高的品級來估價，高過這個只有「高等專門家」的品級。

作家，我也不是「偉大的」，而這個是每一現代新作家必會做的，現在要講到偉大藝術家的話語還嫌太早。他們在從前，青年必得跟他們學習；我絕對深信，在最近的將來，工農大眾將創造和推進

他們，那時候也只能講到文學家的好壞。

我倒不是阻性的人，但「偉大」却驚嚇了我，老雀子的我，很知道麵皮的味兒，對於這些有驕傲傾向的人們我過去和現在就看到不少。驕傲的有害傾向，顯然地，對於圍繞他的人們，是非常不愉快。恐怕的是，過分的誇獎使我會感染到這種毛病，而發展到「誇大妄想狂」，其後會把我送進瘋人病院。多麼好的高陞的結局！

這些牢騷必然有人譏笑，並且許多人會疑惑我在鬧玩笑，做虛偽。讓他們譏笑和隨便懷疑吧，然而——聽啊。

我接到十封從工農通信員，從省文學團體，從「青年」作家寄來的信件。他們一致要求：「把你的經驗分給我們，教我們藝術地寫作。」他們向老作家要求技巧上的智識是合理的。遺憾的是，我不能教他們，只能告訴我怎樣學習的，不久我將告訴青年。他們要求的懇切是確實的，關於這，最好請給青年文學家知道自己的技術弱點，他們勞動的意義和事業的重要，這些是他們渴想得到的。據這些人說，他們是「新經驗」的人，對於厭惡的布爾喬亞底腐朽已經有許多不憤，而有些原來是已經茫然不知和被仇視了。他們不滿意通信員的文章和報紙上的短評，庸俗的人們對於「卑下」作品的輕蔑，青年本能地明白需用真正的「藝術」話語來啓發那塊污地，在那上面滋長着生活的殘屑和霉子。然而他們不應該拋棄報章的「卑下」工作，這種工作的重要他們是不懂得的。

「你，同志呵，稱我們爲『清道夫』——一個工人通信員寫給我。『這話，似乎是濫用的，但是，想一想就曉得：對的。我們是小工匠，新任的人，必須清掃生活裏一切的黴穢。當然，這事業很快會被蹂躪，是的，然而——這一切對他是需要的。』」

另一位寫道：「顯明地，用指甲是刮不脫疥癬的濃濁，這時得需用熱蒸氣和開水，這時需切實做，像柴德林一樣，近來我讀過他的兩本書，國家出版社發行的，唉，我想，就跟這位學習寫作吧，雖然他所寫的不全懂，語言也深奧，然而古保華城的歷史和故事（柴德林的作品——譯者）是非凡的作品呢。」

勸第三位跟尼威魯學習寫作。他却自信地說：「我以爲，這位作家是柔弱的和悲觀的，跟他學不到什麼的。我較喜歡錫亞古森明涅和馬棉西彼涼，尤其是後者，他很透切地了解資本主義的危機，並且文筆很秀麗。」

這些意見能舉出的不只三種，而是數十種，他們都說工農大眾，——正如希望着——在自己當中的智力，十年以後將必然操在蘇維埃雜誌和文學的自己手裏。

我很知道，「青年作家」當中有糊塗的；他們以爲學者甚而至英雄都已經够多，有些初學寫作者也走「著作」是容易的工作；有些已經患了「寫作慾」病，最後，有些少年只寫革命筆調，還有更甚：「你們修改了我的著名的文體，人們都是豬鬃。」

或者寫道：

「你說我觀察不仔細。噢，我多麼討厭屠格涅夫！他在研究自然上「過勞」耗費了自己的時光，」或是：

「我知道自己沒有學問，但我害怕感染布爾喬亞文化。」已經有些初學寫作者，據說是，能够入履糾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物理科學裏滲進自己的見解」了，總之有不少早熟的學者，哲學家和各種吹牛者。他們的大多數是被革命所毀壞的「社會」的碎屑，害怕「布爾喬亞」文化的人們——是製革廠小主，對於愛因斯坦的理論的修改，希望銀行家的兒子來參加和譜如此類。這類典型的怪物永遠存在着的，他們的本質表現着急欲做個首要的，顯著的人物。他們，在我看來，不是全體大眾的特徵。這些人們應加深地注意和努力，因為，再說一句吧，他們是勤勞大眾的智力，將來的「優秀」記者，作家，革命文化事業的大員和防備新作者重染庸俗習氣的壁壘。

這是我的一種感覺。

其他的是這樣：

年紀不小的，認為足夠偉大的文學家，傲慢地寫給另一位文學家：

「你舉薦某某吧」……

「某某」作者的書是沒有讀過，而且，顯然不曉得這本書，就發表關於這書的確實的評語了。必

須想到，這些印出來的評語不是印刷局廣告部捏造出來的。沒有讀過，就已然自高自大地稱陌生的「青年作者」為「某某」了。

事情是微小的，但只能有一件。然而，遺憾的是，這類事情有許多種。它們自覺是有名的大作家對「青年作家」有傲慢的傾向。我個人稱這種「傲慢」是小市民的，並且懷疑裏面的文學意識被專門的妒心所替代。人們也覺得那些小市民一方面引以自傲，同時又恐怕遺失了他的位置——那些自備自已製造英明「天才」文學家的批評家們，疏忽的和匆忙的批評家們所給予他的位置。當勸勞大眾在某一勞動部門裏培養和推動一個公認有才能的嬰孩時，這種每次滋長起來的滿足的感覺，我稱為「文學的天良。」

我是不理會那些驕傲作家對「青年作家」的態度的，關於「我們份子增加了，」我是滿意的，愉快的。我覺得，和蘇維埃一切的工作一樣——文學也必須是集體的，友誼的勞動，這勞動，為着發展，同志間必須彼此共同努力勞作。

著名的「執筆朋友」，在我看來，沉醉於功名太快了，強調自我的色彩太濃厚了。必須使「青年作家」知道，功名——是雜色，有酸味的毒汁，大量地服飲它，孱弱的頭腦就變得惡劣，將沉醉得彷彿喝了一啤酒一樣。服用這種混和劑應該當心，一年間不要喝一茶匙。過烈的藥劑是會使心臟肥大，驕氣腫脹，傲慢，自負，性急，和種種畸形的病。

「沒有鬥爭就是滅亡，」——伊里奇說過。他常說「必須，」——這多麼美麗的習語！

「我們不反對遺產，」三十五年前他說過，他自己一生，他一生的工作並證實他毫沒有否認布爾喬亞文化的珍貴。我覺得，在一切勞動部門，在文學部門裏，他也最珍重技巧，「洗練。」

對啦，「沒有鬥爭就是滅亡。」所以各種不同的意見存在文學團體中間，是非常自然的。它們更可以增長智慧和利益，只要「公認的天才」和文學領袖們不要增長他們的自驕自大，不要把喪失地位的恐懼心帶給他們，這，我上面說過了。文學團體的派別代替了傾向。寫作是非常艱難，唯有堅強的同志們，才能做獨立的，集團的事業。如果文學論爭的語調，有更嚴肅的意識形態，更誠懇和冷靜，較少的時髦，沒有個人的暴躁——那麼省文學團體就不會寫出這樣公平的報告：

「有一種阻礙我們學習的就是文學派別和傾向的惡鬥。寫作是非常艱難，但仍得在不斷的鬥爭和寫作裏寫出寫作。」

這些牢騷我知道很多，他們堅稱，雖然青年不大了解爭論的意思，然而彼此間的「策劃，」青年是清晰地感覺到的。還是自然的，因為在論爭裏個人的開端變得太明顯以致一個工人通信員這麼相反地直寫道：「在這市場和論價的喧囂裏，忠實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心靈被聽得很清楚。」

假如我們真渴望在人們中間創造新鮮的更「人類化」的關係，我們明顯地，必須在自己中間開始創作「新文化。」新文化是伴着勞動人民的利益，伴着勞動的利益開始的。

論青年作家

不久以前，報紙上「讀者和作家」，宣稱：在我國，「據最精確的估計，自稱為作家的有一萬五千人。」無疑地，這對於擁有一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是不算多的。但我不能不跟這報告的作者別列次夫同志說一句：

「甯可少些，可要好一點。」

細察這羣糟蹋紙墨者的工作，我很遺憾地必須指出其中大多數人的兩種本質；便是淺學和自大。下面舉幾個文字上不通順的例證，是我從各種書選摘出來的：

「父親死時，他才十歲。」（依俄文文法，此處的他係指父親——譯者）

「她從頭到腳尖的喜歡他。」（「腳尖」一詞用原數——譯者）——如果她不是殘廢者，她的脚就該有兩個「腳尖」的。

「曾經這樣，當農婦仍穿着自織布的衣衫時，農夫也是馬虎地穿着粗麻布衫褲的。但現在走進蘇個西尼波村，在任何一間農舍裏也（「娜利支」）（俄語，錯作「很少」解——譯者）看到「斯且」（俄語，作「紡車」解——譯者）了。」

顯然，這個文學家自以為是用「本國的語言」來寫作了。但「曾經這樣」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不說得淺顯些，用「立得哥」（俄語，意即「很少」——譯者）來代替「鄒利支」呢？粗線腰帶，棉襪，也都叫做「挪利支」的啊。在某些省內，四輪貨車是叫做「斯且」的。

我們的俄語知識壞極了。

有一個批評家責備詩人把詩「切斷」而產生多餘的行列了。

「作家同志啊，

不管怎樣，

不管怎樣叫嚷，

不管怎樣嘆息，

我們的工廠

和礦場

有着你的

書……

「總共八行！

「這是爲什麼呢？如果寫得更緊縮些，就便於朗讀了。」

作家同志啊，不管怎樣

叫嚷和嘆息，

我們的工廠和礦場

有着你的書。

「誰會證明在內容，強韻，美觀等等上面，「行數增多」是較爲好些呢？」

然而批評家沒注意，沒聽見「不管怎樣」不僅是命令語，而且語音也不「諧和」。他們會指出來：列夫托爾斯泰的「復活」的第一行內，有一句也容納了三次「不管怎樣」。但在這種場合上，即使是托爾斯泰，也不應該摹仿的。

除報章外，青年作家什麼都不讀，而報章文的語言則是吵雜而枯燥無味的，他們完全聽不見現代文字的正確生動的語言。

他們對社會的無知，似乎比對文學的還更低劣。他們不懂文學史。很少閱讀古典作品。他們從報章上來研究現實，彷彿爲了寫關於當前問題的詩歌，只有從報紙文章裏偷竊題材似的。他們寄給我的書信以及和我會談的記錄是非常有趣的。例如其中一個訴說道：

「我寫了：

「青松樹在春天嗚叫着，」

在春天，青松樹響動了。

編輯却說：這是從涅克索夫的詩中擷來的，可是我還沒有讀過這作家的詩呢。怎樣對付編輯的錯誤呢？」

當子勸告：讀讀涅克索夫的詩吧，但如不願意嘲笑詩人，對這類信件通常你就不答覆吧。許多人常常問道：

「作家是不是必須具有天賦或才能呢？」
或是這樣問：

「每一作家必須做什麼才能十全十美呢？是不是必須學習數學，天文學和諸如此類的東西呢？」
有的問題是這樣：

「你對於女作家的觀感怎樣呢，她們真是作家嗎？」

各城市中的集會所給與我的信件，可分為兩組。第一組是充溢着職業性「行人之性」的趣味：攻訐編輯，攻訐正當文學團體，攻訐「蘇維埃社會」沒有好好地關心年輕的文學。他們問道：「你對『的成功怎樣看法呢，贊賞他不過於早嗎？』」「爲什麼不替葉遜爾駁斥那些攻擊他的詩的歐子們呢？』」「真的嗎，安那托爾法郎士的筆名是素列沙？』」「你讀科洛連科的古典作品嗎？』」「除托爾斯泰外，誰是你的教師？』」「你信上帝嗎？』」「什麼使你開始了寫作？』——謀生的願望呢，抑或這是你的職責？」

「當作家不招呼你走近來十步時，學習寫作是困難的。」

「文學與珍萎尼化了。（俄詩人——譯者）在我們古西人們純技術地創作着，然後鼓勵那些無能的「普羅作家」，這些作家的作品，我們是不讀的。請告訴我們應該向哪方面學習呢？一個工人。」

我禁不住想道：多麼……奇怪的一個工人啊！

第二組的信件更有趣些，在這些信件當中關於文學技巧問題占着大部分。

「工人通訊員應該跟哪個古典作家學習呢？」「必須怎樣寫呢，用長句還是短句呢？」「怎樣成為好的忠實作家呢？」「為了改善農民通訊員的工作，你貢獻什麼呢？」「你相信工人通訊員當中能夠選出藝術家嗎？」「你對工人通訊員希望什麼呢？請發表意見吧。工農通訊員組。」「作家急切地尋求新的語言形式，不影響讀者們的興趣嗎？」「請寫一部關於怎樣寫作的書吧。」

許多人詢問意大利工人的情形。在哈利哥他們問道：「現在你對於工人階級充溢着田園詩的危機，怎樣看法呢？」這類問題曾在齊菲斯和卡桑重複被提出過，但遺憾的是，我把原信丟掉了，也記不起問題的方式了。

將這兩組的信件比較起來，我得到了意外的，甚至兩者彼此對立的論調：工人通訊員的信件比那些公開地自稱為「文協會會員」的人們的——是內在地較為有修養，而趣味上更廣汎得多。

除了窄狹的社會趣味外，這些「協會分子」的人們還擁有着過分的高傲和貧血症婦女的銳感性。

寫了幾篇小說或登過兩三首不壞的韻文詩，他們就高傲地談論起自己的創作來了。如果編輯不登他們的『創作』，他們就會歇私里亞地咕嚕着：

『我走了，走了，像挨打的，被開水燙傷的狗一樣地走了。』

這隻狗——是構想得不恰當的。這隻狗，如果挨了打牠不是走開，却是急急跑開的，你再要燙牠，牠就不等候你燙了；如果先燙牠，牠也要急急跑開的，你再要打牠，牠就不等候你打了。

另一個青年，也遭受了編輯冷待的侮辱，喊叫着，『我懇求你不要看我的人怎樣，而要看我用血寫成的東西怎樣，A M 啊，（即高爾基——譯者）現在請你談談關於社會主義的人格吧。呸，這是什麼社會主義呀！』我向一個作家指出了我們的雜誌很少，因而編輯就要看堆積着的數百件的稿子，沒有時間趕看他們的，我得到這樣的回答：

『這和我漠不相干。工作放在他們身上，他們就必須工作，却不要引起人家自殺的念頭。』他們是常常用自殺來恫嚇的。在青年作家的想像中，編輯——是個懷着惡意的人，是憎恨文學的人。青年作家的自高自傲很明確地表現在下面引證的事實中，這是從聯邦各方寄來的兩封信中指出來的。

『稟有天賦的我，請求你特別對我注意。我知道，你是不願意把時間和一點沒有天賦的人們麻煩的』和諸如此類的話語。

『我是農民出身的作家，是最大多數人羣的代表，所以我有優先權，立刻看我的文稿吧。』

這種西班牙式驕傲的表現——委實不少，他們在表面上雖然有趣，但描寫他們却是無聊的。

一個受了侮辱的西班牙人一方面堅稱他的文章會在省報登載了，甚至在共產真理報也登載了，一方面生氣那些發行人不想買他的文稿，於是有些憤慨地寫給我：

「從一百個有希望的青年和成年作家中，有一百個會出人頭地的，假如這些有希望的青年和成年作家不是像許多編輯和名作家的冷淡態度一樣可憎，下流和傲慢。」

必須注意，越少修養的作家，他的「出人頭地」傾向就越加劇烈和明顯。有個青年要求指導：「作家必須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儘快知道一切呢？」這個請求正是顯出許多作家的傾向，——儘快地知道需要知道的一切，爲的要「出人頭地」。

我覺得，是知道的時候了：人們在羣衆間，「不是突然崛起」的，而是循着觀察，比較，研究「道路」走出來的。人類爬着走了幾萬年，直到後來才知道把堅實的手杖握在前掌裏。但當脚後跟站穩了，人類就很迅速地——和牠有史以前的過去相比較——創造出一些高美洛，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羅曼涅索，巴斯柴，明介列契夫，列甯。

很顯明地，求知慾在青年作家中間發展得很貧弱。他們讀得很少。詩人覺得閱讀散文是多餘的，散文家也不閱讀詩歌。然而他們却同樣急忙地寫着互相攻訐的不通的評論。我指出有研究文化史的必要，却遭受負氣的反響：「這對我們是不需要的，我們建立自己的」或是：「我們有自己的」——

像勸他們吸取別人的血液似的。常常是這樣：詩人把擬好的詩送來並請求一閱。你閱了，把自己關於他的「創作」的意見寫給他，就接到寄信人這樣的回答：

「接續寄來的詩評，我能以充實的理由和確定的信念來反駁你，那就是：我所寫的詩是圖畫似地反映着現實精神，有些詩的韻律是萊蒙托夫的，而其餘的——是俄國民粹派詩人底氣質的。關於音樂，我不需說了，因為在俄國人民的一般的和個別的生活里面受了苦難的靈魂都滲入音樂裏了。見解的簡樸是一切詩歌創作的本質。我不承認技巧是傳達思想和激發精神的。我將從自己心坎裏所發出來的靈感繼續寫詩，我想是不錯的。我預先說吧：後悔是不會的。」

其他的「創作家」寫道：

「對啦，我承認我沒有才幹，但對這事業的熱誠是有的，成就也是有的。我的一首韻文詩在報紙上登載了。」

可憐的幽默家，很可憐的啊！最壞的是，青年這樣不懂現實，好像他傾心「出人頭地」，就已經從現實中翻起來了似的，他不覺得自己是生在最偉大的革命時代，生在悲壯的，大災難的前夜。」

x

x

x

不少空談家到處存在着，他們讀書只是爲着要「反駁」，高唱自己的革命理論，而推着較爲慎重，較爲忠誠的同志前進。我會在一篇文章裏問道：「爲什麼「青年」詩人不更接近現實，不跨上酒店

的歌台，不聽聽那些大多數也是青年羣衆的批評呢？他們或許進酒店不單是爲着喝酒，而且是因爲他們已經煩厭了電影院的沉悶，笨拙的陰影吧？」

兩個約亞第的詩人反駁道：

「我們認爲你的勸告是錯誤和有害的，是縱容葉遂爾派的成長的。你相反地寬恕葉遂爾，使他成爲合法，把蘇維埃社會推上放棄跟他們鬥爭的道路。」

他們回答了，我發覺他們專心讀書仍沒有學到什麼，而且不明白，在酒店和在工人俱樂部一樣，不單是能喝啤酒，而且還能讀詩歌的。青年詩人也非常不願意參觀工人俱樂部。兩個詩人在新聞報上寫道：

「我們贊成 A. M. 關心青年詩人和蘇維埃社會的提案。這是恢復歌台的路徑之一，教育人民委員會管束得太利害了！必須組織露台詩人支部。」

然而我覺得，這些好主意只停滯在響亮的吶喊聲中。他們告訴我這樣的實情：選派青年作家到集體農場去參觀工作一兩個月。要派十六個人去。立刻在文學團體中間開始了『地盤』的爭奪，激起了辯論：多少名是這個或那個團體有權選派的呢？爭論的結果，到了集體農場去的只是兩三個。他們還告訴我：莫斯科保健局建議作家在『勞動休養所』裏負起有教益的文化工作。在那裏，誰都曉得的，正圍聚着許多各式各樣的人們，而且有廣闊的範圍公開給他們放棄。這也因爲某種原因沒有實行。

青年散文家和詩人是很少參觀工人俱樂部的。

青年作家對現實的興趣顯然是低落的，觀察技能發展得很薄弱。人們一般地常常要急急地做出「最後結論」，這缺點尤其是青年的特性。匆忙是阻礙着人們去注意大量的佔優勢的事物的——而現實我們和世界各處一樣仍容有着這樣不良性質的事物。不待說，為反對這些事物而鬥爭是需要的，無情地暴露它們是需要的。這是諷刺詩能夠做到的，然而我們詩人和散文家中間却缺少諷刺家——這是我們對佔優勢的事物沒有痛恨氣憤的表現。」

於是，在我們現實中就急需注意，開發，描寫一切穩固地生長着的有用，新鮮，「明確」性的事物。這新鮮的事物是青年作家不大覺得的，顯然是由於他們不知道舊的，他們太熱中於傾聽人們的話語，就代替了在事業中在對生活發生了新的和舊的，衰老底悲劇鬥爭中——學習觀察新的事物。如象他們留意科學工作和工人生活，他們就會觀察到這新鮮的事物了。這些工人不僅是喝燒酒，並且是在神話般的困難情勢裏真實地英勇地建立着自己的國家的。當你讀到當代詩人的詩歌時，——這些詩會以冷酷的，勃留斯基的修辭或貧血的「革命抒情詩」，來激動你，但是在這些詩裏面完全缺乏真實感，事實，缺乏真人物。然而，須知是明白的時候了。我們的世界不是用言語，而是用行爲，用勞動來創造的。

這裏有一種對過去不熱誠的惡劣的特點：不久以前我收到一個「作家協會會員」的明信片：

「人呢！我們現在這裏進行着熱烈的討論。主題是「高爾基的流浪漢是怎樣的？」所有的工人、共產青年團員，學生都加入辯論。大家都發言了，但所得要點仍未發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或許我們都是「委員」（按指革命工作者——譯者）或是和勞動階級混在一起生活的人。確實回答我們吧，我們却仍舊辯論着呢。」（標點是明信片的作者加的。）

這可能是滑稽。但當時這是滑稽的一種，滑稽家把它作為聾人聽聞的事件。我的意思以為，「明信片」不過是寫的寫者無知的結果，他顯然是不熟識委員們的傳記，不熟悉他們過去的英雄事業的結果。此外，這個「作家協會會員」由於自己精神上的盲目，也瞧不見勞動階級領袖所做的和要做的工作。

顯然地，可能引發勞動階級各種皮膚病的寄生蟲繁殖起來了。受屈於歷史的，渴望着「安慰」和「任何生活的調整」的小市民更高聲叱罵一切了。有些人們利用文化革命口號來掩護「調整」「任何生活」的自己的熱望。

這一切觸引起工人的社會的銳感，悲觀的思想。在頓河煤田的同志寫給我：「我深覺得利己求己的，笨拙懶惰和互相嫉忌，爭吵的傾向是在我們青年作家中間興旺着了。」

烏拉爾人讀了馬棉西彼涼的書，寫道：「馬棉寫得多麼好！而我們的孩子（指烏拉爾青年作家——譯者）呢？他們拿起報紙，讀讀評論，寫寫書，看看親友所寫的那篇批評書——是無價值的，腐爛

的，簡直看不懂，好像不是俄文寫成似的。必須給這些廢物做點什麼了，必須告訴他們什麼給作家，讓他們寫人間吧。」

下尼哥城的同志說。

「當然囉，十年來尙未完全把教育改造過來，我們新的權力固然迅速地採用理論了，可是實際上沒有經驗的，也沒有好好去體察同志的生活經驗。這是壞的，危險的。當我們的領袖告退的時候，我們的青年將怎麼辦呢？」

問題是極其嚴重的，因為可能的是：一部分青年，各色各樣的，「滑稽家」——另一部是搗亂份子——他們將冷淡地或甚至色情地觀察小市民怎樣企圖強姦歷史。他們將如兩個女共產青年團員和一個「最近從鄉間來到都市的淺學青年」一樣旁觀着：條合哥亞製造廠工人宿舍的院庭裏，兩個卑鄙的壞傢伙強姦一個十四歲的少女。

所說的這一切，爲的是要引起大家注意青年作家羣的生活。不待說，我並不是說這新作家羣全是淺學的。我很知道，雖然有着許多淺學和毫無修養的人，在青年作家之中却也有許多熱望着學習的有天賦的人。在他們當中有着許多能幹的人。然而他們都需要學習事業的技術，他們大多數在技術上是沒有武裝的，這無限地損害他們中間許多人，不能使他們盡力發揮他們的才智。必須爲他們設立「文學技巧的課程」。工人通訊員也應該注意這些課程，這對於兩種組合彼此都有益的。我想，沒有指出

這種聯合的顯著利益的必要。在課程上，必須閱讀關於俄國文學語言與所謂「本國」語言的關係的講義，必須閱讀關於俄國文學史與西洋文學史的關係的講義。沒有什麼「創作理論」，也不需要什麼天才，却需要提供關於工作的顯明概念，這最好不要用哲理，而要用事實。

這類課程無疑地只有吸引一部分真實而誠懇地學習的青年和工人通訊員，而其餘那些視文學為易於賺錢和可能「出人頭地」似的，所有這些「孩子」滾開吧。那個時候蘇聯將有「更少的」文學家，可是好「一點的」。現在對他們的態度——疏忽和漠視的態度——我們是助長着非常有害的現象——粗製濫造的現象。工人階級應當明白，文學家的社會的，文化的教養——是牠（階級）的事業，牠的血液的，非常有益的事業，比那珍貴的「勞動樂園」，「文化樂園」的建造更加有益。工人階級應當明白，在國家——勞動階級作爲主人的國家——的生活裏，沒有勞動階級的注意和最活躍的參加，必然什麼都創造不出來的。

（一九二八年作）

再論文字通順

一個青年作家把短篇小說原稿寄了出去，在附帶原稿的信裏寫道：

「短篇小說爲菲律賓所喜愛，也受到國家學會的獎勵。」

這短篇小說有二五〇——三〇〇報紙行數，它的要點是講到「一個受過舊制度感化的祖母」，跟着自己的孫兒先鋒隊員後面，參加某個蘇維埃佳節；那裏的麵包店工人驚奇地擠出她——就是從前那個「製造法國麵粉的最優秀熟練技師」西門的母親；他們擠出了並收集了「三個金幣和三盧布十八戈貝的金塊」給她，這之後，祖母「滴下了多量的，愉快的眼淚。」

關於「滴淚的」祖母把「舊制度的感化」減少了百分之幾，作家是沈默不語的。寫成這短篇小說，是爲着要讚揚小河歌者——孫兒，使讀者奇異地憶起八九十年代「兒童文學」裏的品行端正的兒童，那時候雜誌人刊行了「華杜斯奇克」，在它每頁上正這樣可憐地描寫着可愛的兒童，像「滴淚的」祖母的孫兒一樣。

受獎勵的短篇小說，——照作者的話，——「爲菲律賓所喜愛，也受到國家學會的獎勵」的，被寫成下列的語調：

「受過舊制度感染的祖母安尼斯是靠著死去了的兒子的「技能」和每月所賺得的薪金來維持生活。祖母安尼斯六十歲了。她很喫力在麥田上走著。但是必須好好地過活呢——孫兒科司球斯克還幼小，才不過九歲。」

「今天祖母安尼斯伊泊利多富鄉舉行彌撒祭，默禱著親生兒，科司球斯克的父親。心靈是輕鬆了，却是疲倦——腳沒有勁，靴子也沉重，牠們是很陳舊了，那一雙祖母的靴子……」

「祖母惶恐地四顧著——在莫斯科是很喧鬧的，因為明天也是大佳節，只是不屬於祖母的，而是科司球斯克的。」

「祖母安尼斯左顧右盼，却自喃自語著，一定是喃著科司球斯克：她的科司球斯克是聰明的，只有他是她唯一的親人。」

全篇小說是用這些「油」，這些糖醬的語言寫成的。作者收集了柔和的，「感動心靈」的文句：「麵包師」，「嬰孩」，「油」，「小塊」，「白楊」。但是祖母稱革命為「邪惡的」，——這當然是作者想出來的，祖母本人不能想出這樣聰明的話語的。

短篇小說的語言是這些：「午餐是鮮魚和葱醋，其後——是一盤烘蕃薯」。「他父親熱得發了狂似的」，等等都是這一類。

這可咀咒的祖母，表露出作者的完全孤立無援。作者在十五行內把她講了十次，而在原稿的十二

頁內所有她的名字差不多被碰見二百次。總是碰到：祖母，祖母的，給祖母……

「學會獎勵了」短篇小說的那個事實，當然是作者負責的。然而我害怕作者的反對真實不是誤會的，我害怕「國家學會」主辦的兒童讀物委員會真實地「獎勵了」短篇小說。從教育人民委員會呈給列寧格勒的學會分會的聲請書，就表現着：坐在这委員會的人們關於文學的意見是毫無根據和不可解的，而水，火，這些人們認為是「抽象的觀念」。

每次，當碰見文字欠順的軼事的這種奇異的表示時，牠似乎不是簡單的無識，而是「故意的」，存心作惡的，牠引起這種印象，彷彿人們有意識地企圖毀損蘇維埃政權的真實似的。我鄭重地說吧：除了挑選良好的兒童讀物的委員會底境狀，正獲得這樣的印象。

「很少藝術地」，「遠離藝術」，「很少趣味」，「沒有趣味」。而為什麼「很少藝術地」，「遠離藝術」——委員會是沈默不語的。沈默——是不容許的。如果委員會想看見「許多」有藝術的兒童讀物，他就應該解釋：從所挑選的讀物中牠要求怎樣「許多」和怎樣的藝術。我覺得，委員會關於藝術概念——是不清楚的。事實使我深信着：委員會淘汰某些書，乃由於看見他們裏面的「想像」。

關於「飛氈」的故事——也是想像，正如古代神話關於空中飛行的原始人類——哲夫爾和他的兒子伊卡一樣。這種「想像」對人類的生活会喚起了飛躍的傾向。委員會必然知道，現今這「想像」——就是真實，飛機在工廠裏被製作出來了。蕭爾維爾納（法國作家——譯者）的潛水艇——也是想像。

月亮上飛翔——是狂妄的幻想。然而現代對它完全切實地完成了。阿爾哈密特（天才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譯者）的無窮螺絲，織機，蒸汽車，發電機，內燃機就是用想像來表現的。那所謂文化，——就是經過人類的「想像」。藝術是孕育在想像裏。科學——是想像的實現。同樣，像想和思維把人類提高在禽獸之上。蛆和蚤子永遠停留在原狀，因為牠們缺乏能力和思想——「捏造」，「思索」。「藝術」沒有「想像」——是不可能的，是不存在的。如果兒童讀物委員會想要在新俄羅斯真實地增長了新的藝術家，新的文化創造，——他就不應當反對「想像」，殺害兒童的幻想，因為人們已經學會把自己的幻想的「想像」變成現實，而人的這種特性——創造的特性是被險惡地傾於消滅在兒童中了。是採取被勞動所創造的簡單，明顯的真理的時候了；那些越好些的，近代技術就越容易把一切想像和思維，幻想和臆測——變為真實，變為人類求生鬥爭中的武裝。

培養文化技師

「勞働階級應培養自己的文化技師」。這——是歷史的訓令，時代的口號。爲着達到這目標，蘇維埃政權開辦各種高等專門學校和技術所，爲着達到這目標，黨把政治智識來武裝工農大衆，使蘇維埃中建立他的階級利益的意識，對工農指出歷史任務的正確理解——創立自己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國家。

在蘇維埃國家裏發展着巨大和艱苦的實業化的工作，根本改變農業方法和形式的工作。這工作不會這樣迅速和成功地發展了的，假如工人大衆下層不知覺他們是做着自己主人的工作——建設自己的國家，創造自己的文化。使國家在實業上富強，勸勞大衆在自己面前提出一個「五年計畫」來解決這些空前複雜和艱苦的事業。普通的「下層的」油漆工人斯洛勃德齊克夫同志着重地提出「實業日」的卓越的見解，而我看見了二千五百個列甯格勒工人在拿爾佛水壩後面「文化所」的優美的禮堂裏一面地舉行一個多麼熱情的集會。

這一切是在蘇維埃國家的不暇窘迫的環境裏，在布爾喬亞方面從外邊對蘇維埃國家的經常的，繼續不斷的進攻裏做出來的。歐洲布爾喬亞在法國主廳裏看見自己的避難所和救世軍，雖然法國主廳裏

免地迅速地消滅布爾喬亞奴役工人階級所創造的一切最好的和珍貴的。

我國前進的黨的力量和無黨派的力量都分配在建設新國家上面：這新國家是當着國內不穩的和騷亂的，知覺的和不知覺的「惡徒」存在，當着官僚主義的類似怠工的延長存在，許多「機械的」公民私自惡聲毒吃底下，當着小市民對臨時修改的新經濟政策底的動物學的仇恨底存在，當着工人自己中間的左右動搖存在建設着的；這新國家是在表現着醞醉，怠惰，暴亂，怠工，出品不良等等的羣衆底愚昧和野蠻的情況之下，是在羣衆意識仍未充分了解，仍未深切領悟工農國家的工作——就是工農自己自己的工作，至少限度這工作的成長——是使他們的國家富裕，而並不是使某一個人富裕這一事實底情況之下建設着的。

然而在這一切惡劣情況之下，國家仍然成長着，仍然和每個忠誠無私的人迅速地，奇異地向前邁進着。

除了上面所說以外，仍須補充如下：我們勞動階級從布爾喬亞那里接受技術上工場和工廠的營養設備，壞機器，城市和鄉村的野蠻的生活習慣，反抗崩潰中的統治階級底歷史力量使這力量具體化爲勞動階級的意志。在列甯格勒，我看見了象徵的「增築」：對這一萬電力的電台，又增築了另一個九萬電力的。建築道另一個電台當然是根據電氣技術的最新的原理。和這個「增設」——如一個建築工人所稱一樣，並列着的二萬電力發電台感動了孩子們，這些孩子是成人帶領的。這些「增築」，在編

確實的改善過去的以外，必須知道和記着這些迅速地使國家電氣化底新穎，莊嚴和成功的事業：「國營得悉甫爾水力發電所建設」，「伏爾加——頓河運河」，「土西鐵路」，列甯格勒港的機械化和擴大，穆爾曼港的擴大，北部地帶的森林栽培和農林組織，鄉村集體農場的廣大成長，「國營農業機械建設」，巨大的集體農莊，烏拉的「磁石」廠，船舶和水車製作組合，許多新工場和工廠，整個新文化輸進農村去等等。一切都是不勝枚舉的——縱使是最好的——我們關於所做的知得太不好和太少了。尤其是用自己的肉體創造國家工業化的技師的勞動大眾特別知得不好。

勞動大眾仍然更不知道，爲自己創造文化技師是多麼需要，而且對於這些技師可能在縮短時期內出現是關心得多麼不夠。工業武裝是需要和智力武裝——和理智武裝，創造的組織，革命意志——同時存在的。文化人是慢慢地，艱難地被創造出來的，——布爾喬亞的一切文化艱難的發展史都動聽地告訴我們這個了，雖然這文化是成長在他人的勞動上。然而我們勞動階級是迅速地成長着的，這在許多事實當中特別有兩種可作證明：即共產青年團和共產少年團。共產青年團很明確地曾經宣告而現在仍宣言着自己的生活力和自己的創造力。但我曾說過，對共產少年團的發展是注意得不够的，——而在我看來——費了很少的代價，共產少年團仍然迅速地發展着。仍舊過多過共產青年團所給予的保證。沒有經營那些最困難的歲月，被大多數共產青年團經營的歲月在某種程度上是不能瞭解共產青年

年團某部的神經的，——共產少年團保證給予工農國家千百個強壯的和精神健全的，有奇才的工農人員。關於這個，我將在另一地方講，而現在回到我的主題吧：「勞動階級應該創造自己的文化教師」。

兩種最大的力量成功地幫助着培養文化人：便是藝術和科學。和自然科學並列着，藝術文學不過自然科學——如果不大于——是影響人類智慧和意志的強大工具。除了各種糊塗虫和那些宣稱着「意識決定存在」的人們外，未必有誰要反對這個吧，這些人彷彿不看見，不相信自己的意識是充滿着力量來創造新現實似的，雖然我們的十月現實也必須說服那些盲目的和耳聾的。

在我們藝術文學的領域裏，有教育意義的評價不是全都對的。這在省裏特別可以看到。例如吧：邊區報紙，「蘇維埃西伯利亞」的編輯，寇爾斯，——曾經是個安那其主義者，人們這樣告訴我，——他標榜着反對藝術文學，一個他的信徒潘古遜曾說過「藝術文學本質上是反動的」。這當然是「列夫」（藝術左翼戰線）死的理論的偏狹見解，從我的見地看來，——不是從協會的見地，而是從觀察了五十年而直至今日還觀察着文學的革命教育意義的人底見地看來，——潘古遜不算是個無知少年，而且我認爲很對地稱他是文化工作部門一個不自覺的「惡徒」的人。又如：報紙附設文藝副刊。這裏有個根琴同志對文學團體宣稱：「黨和蘇維埃政府供給了紙張，不是爲着印刷詩歌和短篇小說的」——文藝副刊是被清算了。

勞動階級不能夠和不應該承認這些很類似於文化工作的專徒的輩人們，文化技師們，這些輩人少地從事於報章，雜誌等等主要事務的「暴徒們」，我們是有不少的。這些人們不知道或完全不懂得列甫，馬克思，恩格思和我們許多布爾什維克，黨的组织者，黨的精神領袖們對於藝術文學的興趣。他們也忘掉了一九二五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五月決議。

伊。羅茂同志在我們的一個雜誌上登載了一篇論文：「無黨派文化主義的三年計劃」。和當黨青年批評家的論文中一樣，在這論文中有很多的引證，它們都指出國家圖書出版局，刊印古典作品，是做著有害於勞動階級的事業。除引證外，在論文裏沒有一點是從作家的經驗中直接引出來的。但我覺得，除引證外，作家最好仍應該知道一些什麼。譬如，圖書統計，在這些數字的統計中是稱出勞動大眾對舊作家的正確態度的。羅茂同志未必能夠指出這些對工人是有害的，例如：「波利沙高登涅夫」，「死靈魂」，巴爾扎克的「農民」，柴霍甫的「農夫」，布美羅夫斯克的「小市民的快樂」，浦甯的「鄉村」，還有半百或一百這些關於不遠的過去的真實故事。羅茂，潘古遜，根琴諸同志主觀上的評價太濃厚和無根據，只增強着言辭的紊亂，使向着特別目標——從工人大眾中培養文化技師——直接的和縮短的行動變為虛無吧了。目前在世界上，評價仍然比現實的和無可辯論的價值更大些。因此反對每個引證，必然推出反證它的二三十個引證來。

羅茂同志引證着：「我們普羅列塔利亞是够堅實的」，並認為這句話是反擊「虛偽的。自由主義

的理論」的。如果羅茂同志——是工人，他的結論是極奇怪的。顯然地，他，羅茂，不相信他的階級是「堅實的」，並且害怕着古典作品把階級的頭扭向右轉。但是羅茂同志，顯明是忘掉了我們勞動階級——是本國的主人，他在國家裏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以最新的實業的和農業的技術來武裝國家，並且靠自己的一切力量把勞動階級的頭扭向左轉的。

他沒有看見，使工人讀者迷惑於古典作品裏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情節，書的外表趣味，書中的內容，觀察和知識的豐富，書的言辭描寫技巧，即是，這一切都是大多數青年作家仍然所缺乏的，目前也不可能有的，這是由於他們不大熟悉文學工作技巧的原故。現在如法捷也夫，蕭洛霍夫這樣的的天才還只是少數。然而，如我們所見一樣，勞動階級完全正確地評價了他們藝術家言語的價值了。

反對藝術文學和有教育意義的古典作品的人們必須明白，而且是明白的時候了，布爾喬亞人道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對於勞動階級是成爲誤解的機構了，而這樣產生是很自然的。這樣是必然的，因爲被勞動階級親自創造的現實是密切的，而人道主義意志衝動的散漫的，貧血的，多餘的意識形態是陌生的。羅茂同志却毫無根據地辯解着在勞動階級裏有着「特權」的存在，即是階級的無能力的機構產生了病症，對它是沒有關係的。它——勞動階級——仍舊着這種疾病，——是眞確的，然而它順利的擺脫病症——是更加眞確的。但如果沒有擺脫病症，那麼已經到達的地方等於沒有到達，已經做了的

等於沒有做一樣。

對古典文學的態度問題變為技術的問題了。一切工作都需要技師的。古語說得很對：「一切事業是懼怕技師，而有些技師——却懼怕事業。」（如中國話的「事在人為」——譯者）要不怕事業，必須很好地研究材料，熟悉它們。懼怕事業的人，只是那些不懂事業或懂得不好的人。那些人門，將要被複雜事業嚇倒的，也必然沒有能力來發展事業和企圖使它簡單化。簡易化的結果常常是這樣：「砍下了，劈開了，——是輪子啊！坐乘了，——啊，好啊！回頭瞧，——放着一些吧。」

無天才，無能幹的人們，還有那些匆忙地佔據顯要位置的「詐取者」，小人們，都是屬於這類企圖把事業簡單化的人。這些壞且們，遺憾的是，勞動階級已經將他們散布到己身和自己的隊伍中了。

勞動階級的前衛，青年文學家，是不是必須向老技師學習用實際的事仿藝術的事業呢？很明顯地，這是必需的，因為他們必須吸取和熟習技師的工作方法，「祕訣」。列寧格勒的工人得到了美國包工場的標準設備，而後學習了機器的全部技術，決定用自己的手建造同樣的設備。沒有一點使他們異的，如果他們要完成這些機器。對着二萬匹力電台創造了九萬匹力的「增築」，工人聘請了德國工匠來裝置汽鍋。德國人在半年內裝置了第一個汽鍋。借助於俄國工人，裝設第二個快了一個月。裝設第三個，第四個汽鍋還要快些，而工人告訴了我，最後第六個汽鍋，他們在五個星期內就裝設好了。這意義就是說要學習技巧，而我們就必須從那裏提取比擬和教訓呢？從古典創作部門裏啊，而不是從

渾濁的，不經思考的「哮喘」裏，不是從工作前面的危機裏，不是從鄙俗的安那其主義裏提取！

我們有非常之多的批評，它和批評家的自我批判，——和個人行為的批評，和自我思想與自大的批評是毫無相同的地方。學得了一點兒智識來寫作和或多或少巧妙地从其他書籍中引伸例證的人們，——這些人們已然想像自己有點類似勞動階級的「精神領袖」了。時機未熟啊。並且是有點不智的。要有恆地誠懇地學習接受正確謹慎的勸告。我勸告他應該記住：你並不是什麼都懂的，而在現實環境激變中的現在，你越是生活下去，越是難懂得一切。

在我們這裏曾經堆積了而且現在仍堆積着一切更有生氣的，實際的事業。在全體事業中佔着一個首要位置的，——是充實青年作家，初學寫作以熟練知識，以文學技巧智識底任務。青年作家是在戲劇的環境裏，——他們渴想學習，他們必須知道實際創造的方法。教導他們——不是對聯的。蘇編輯把文稿退還他們，並附註着這樣的評語：「欠佳，不適用，」「欠佳，但有好的地方」，「學習吧，留心工作吧」，「不新奇，有許多花樣」，「學習技巧吧」。

所有這些話語對於青年作者是有講到什麼的，這不是教訓，而是嚴厲的，不滿意的警告。蘇編輯那裏接到三兩篇附註着這些評語的文稿後，作者開始把編輯自爲另一種人，甚至自爲自己的敵人。他給某人寫出關於編輯這樣的假話：

「坐在編輯的軟沙發椅上，整天喝茶，同女打字員調戲，張開滿足的眼睛凝視着。我們對他却將

像法庭上的叫化子對着神父一樣。」作者不曉得，在編輯面前擺着超人的任務——閱讀成百的文稿，而身體不可能專神閱讀一切文稿。然而勞動階級仍須有自己的書辦技師，小說家，敘述者，戲劇家，新聞記者，諷刺家和幽默家，舞台工作者，從那裏必須更快地掃除古舊的，卑鄙的粗俗。

一九二九年

論能力的浪費

人——是愛名譽的。名譽——是才智的或道德的權力，它——已經常常是人們支配自己的權力了。名譽心被養成了，被階級的國家培養着。在階級的國家裏，正如一種所謂「諺語」的古典所說的一樣，「人們相處如毒狼」，「毆打以求存」。

在階級的國家裏必然地留存着農奴，部夫，或強盜，地主。當地主常常偶然稱贊農奴為英雄的時候，農奴因此就用諛言醜態來奉承地主，敬佩他們的智慧，辯護他們的殘酷，默認他們的權柄為合法。功名心——是古時的毛病，這毛病是自衛的必要引起來的。名譽把人從生活的陰暗中推着前進而超越別人，達到更廣泛，安適和滿意的地位。我相信——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在下桑的奧斯支，從前有個搬貨工人。他設法說服他的一羣夥伴，說是他的臍高過別人兩寸。許多人覺得——我也覺得，這搬貨工人的臍被放在尋常的位置是根據天然律的。雖然這搬貨工人是夥伴中的一個弱者，這羣夥伴却堅信他們這隊伍裏面有一個非凡的人，而且，當反對這個信念的時候，他們就生氣，把不贊同的人毆打了。他們覺得，人的名譽帶着比尋常的高過兩寸的臍，是顯出他們最特別的光采而且把他們從其他夥伴之中區別出來的，例如：像法國人的拿破崙或英國人的海軍上將牛

遜從其他國家之中區別出來一樣。

波里斯皮涅克——是人，因此他是愛名譽的。他——是能幹的，還是無可爭論的了。然而他也深信他的階比所有其他人們的高過數寸，而這使他太匆忙在求名的路上跑。他迅速地活着，他也迅速地寫作。他的紊亂的，太勞心的，神經質的，而結果不很像樣的俄語引起這樣的印象。皮涅克他需要把他的散文和小說都譯成世界各國人民——英國人，爪哇人，中國人，耶哥人——的語言。在求名的路上奔馳，已經好幾次引着皮涅克「不向那邊」跑了，他爲着他的傾向而陷於困難，於是公開自悔錯誤了。

這理由不獨是在名譽心，而仍然和與他同代許多作家一樣，在思想上，他是社會主義者，在實踐上却是個人主義者。這樣的雙重人格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即在一部門內劇烈的創造的十二年間，人絕不能不受培養的，——十二年，無疑地，歷史稱爲歲月奇蹟。這裏的階級性也是虛弱的。我們從普羅出身的作家的生活和工作中就看到許多例證。當受了過去可憎的和卑鄙的教育的人們被歷史迫着在新的路上生存和思考，而創造新的（教育）的時候，雙重人格，遺憾的是，在過渡期間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所看見的謬誤，甚至罪惡，漸漸成爲更慣常的，像生活一樣更確信地更迅速地在新的路上實現着。

• 理智——是可見的，但感情——是盲目的，理智是返老還童的，但感情——是老的。就是這樣。

皮涅克因爲自己錯誤，就獲得了太嚴重的報應。這報應有如毀滅他在蘇維埃文學部門裏一切職務

，（註一）然而問題不單是關於皮涅克。爲着以嚴肅的態度對人，我是奮鬥了一生的；而我覺得，這鬥爭必須在此時此地加強着。此時此地從羣衆中選拔出來的新人，他和那些想同羣衆抗衡，同他的創造活動並肩地走的人，一同開始改造現實。

我們是不是充分地關心這些人們呢，是不是能夠充分地評價他們的工作，才能呢，是不是對付他們的錯誤，對付他們的過失太嚴格呢？使我們提出這些問題的，不是感情的人道主義，而是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的，必須節省人類和它的助手在這「世紀的偉大事業」裏的能力（新生活和新人類的創造者的能力）的意識。我們能不能地奪這些助手，引爲自己的伴侶呢？我覺得，我們不能的。

關於「讓我們沒有侶伴就走吧」的大言，是不能說服人的。還有：他們時常從國家新主人——專制階級的墳墓們中間，從那些仍不是叛徒，但隨時能叛變的人們中間分散出來。

我們養成了一種愚笨的習慣，就是把人們拖上有名的鏈條，隔些時候又把他們從那裏擲下塵埃裏去。我不想舉引這塵芥的積塵待人類的例子，這些例子大家都知道。他們使我想起一七一一——一八二一年對小賊用「私刑」的十幕，最可恥的戲劇，牠的作者是一些胸襟狹窄的人。每次當大家嚴肅地要擲斥一個瀕斃的人，佔據他的位置而攻擊他的時候，人類這些狹窄，卑鄙，狼狽都很厭煩地被想起來了。然而現代，人類同時獲得了特價，就是執行大衆應與意志的創造個體。在營屯，在廣場，在工作檯上，我都看見這種人，我到處——都看見。他奇異地做着艱苦的工作，而現實向他提出更廣泛和嚴重能

要求。奇異地懷抱着，把揭着種種現實——不是力量，不是「鍛鍊」；人們爲着發展和擁護「新世界」的鬥爭是武裝得不很充實的。工人的孩子們活潑地跨進了這個新世界，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在他們眼前做了。這必須緊記着。當你痛恨和責備的時候，不應當用卑鄙的，幸災樂禍的，帶着病態的熱情，這種熱情完全是缺乏憎惡的健全感覺，這種感覺應該爲階級所擁有，爲歷史所賦予於階級來消滅一切卑鄙的狼攏的政權底千百年來的遺傳。我們是生長和工作在外敵的緊窄包圍裏，是生長在貧民的政治意識憤怒地成長，在帝國時代農村開始「十月革命」的歲月裏；誰都知道，我們是生長在有着許多內敵，自覺的和不自覺的「惡徒」的我國裏。這一切必不能威嚇我們，可是每一分鐘不應忘記這些。必須記住，我們自己人羣中仍沒有這麼充實的幹才，在艱苦和偉大的事業裏來幫助我們，並把自己人羣中的一切害蟲推翻和踢開。尤其需要關心那些將要代替父代的孩子們，不要教養子孫在感情上，思想上仇視我們。如果我們引用那種態度對人，我們很可能地從自己的孩子們中間製造出敵人的。

當然啦，某些人們會說我是宣揚自由主義，「調和」。這是謊話。那唯一的真的正義，那深入我們勞動階級的生活裏的正義，是不容忍調和的，也不能，不需要的。我說有節制個人能力浪費的必要，爲了勞動階級的利益，有發展着培養着這種能力的必要。

一九三〇年

註：這是講到關於一九二九年皮涅克在國外所出版的小說紅色鄉村。這部小說被蘇維埃社會與輿論界認爲帶有反蘇維埃的傾向。（編者）

文學的突擊隊員

正如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工人政黨作爲主要力量，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組織全體工農大眾的理智和意志一樣，突擊隊員們，一方面在實踐上，在生活經驗上製定勞動紀律和勞力節省的方式，一方面在社會主義的工業和農業的建設部門內也表現着主導的力量。

正因此是很自然的，所以無黨派的突擊隊員這樣理解黨的總路線的意義，而且這樣願意加入黨，使黨擴大了，也就是擴大了自己的創造力。

蘇聯工農大眾，從牠自己當中選出了突擊隊員入黨，成爲更有創造的，堅強的和全權的力量。黨的成長——這是工農智力的成長，是他們理智的成長和對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影響的成長。這影響發展得越強大，資本主義的武裝劫掠進攻蘇聯就越少可能。有意識的和忠實的黨員的數量發展得越快，跟惡徒，跟蘇聯內各種「暗害者」的鬥爭就越容易。

集體農場的農民無疑地要仿效工廠和工場的突擊隊員的，而在他們當中黨員的增加却更順利地幫助他們和富農鬥爭，更快地戰勝富農。除了暗害者和富農外，工農還有一個大敵人，這敵人——就是陳舊和習俗的殘餘，各種邪教和對理智力的懷疑，這懷疑是因被千百年奴役的，不自由的生活，被教

會，祭司和千百年卑賤，齷齪，無良心的鄙俗的，地主的生活深入於人心了。

爲反對這種野獸的，建築在貪婪和嫉忌上的，在「每人顧着自己，上帝顧着一切」的原則上的生活而鬥爭，——反對陳舊的鬥爭將更堅決，更順利地進行的，如果工農在自己黨中能把握着生活的基本力量——理智，而且只有從陳舊中解放出來的深刻的理智才能够從事於一切和爲着一切而工作。

黨的路——是意志解放的道路。黨的成長——是工農力量的成長。革命的目的——就是把人們從過去的桎梏，從古老的，卑鄙的世界底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有些人們以爲黨和蘇維埃政權是阻礙，壓制個性的發展，個人的發展。

這似乎是因爲人們很難脫掉他們千百年的習慣，因爲當理智的力量找出他們皮膚下的老膿瘡的時候，他們是痛苦的。頑固的小市民怨恨着生活的新趨勢的劇烈成長，這些人們是不能够冷淡地生活得像蜘蛛一樣的：每個——是在自己的角隅，在自己的蛛網裏。

當人們堅決地放棄宗教，國家的偏見，當全體勞動人民感到和認識自己團結一致的時候，個人精神發展的自由是會來到的。

期待着這個並不如所感覺的那麼長久。要從過去的殘餘中把人們解放的日期縮短——是隨我們的意志的，這就是我們努力的事業和目標了。這就是爲什麼大家更要緊握，集中這力量了。黨也是那種場所，那種工廠，在那裏把散漫的工農的力量集中起來，從那裏，產出的現實結果，黨常常創造出奇

蹟……

根據突擊隊員所寫的幾篇不大「文藝化」的論文，根據這樣少的材料，能不能把以前所寫過的一些高遠的思想提高呢？（註一）

能夠的。磁針，別針和一切金屬細物是從大塊金屬製煉出來的，這金屬又是從無形的金屬礦類煉出來。這金屬礦是由眼睛不可見的微粒所組成的，而人類的智慧用這些微粒創造合理的，猛力的機器。機器才做出金屬細物，拉出雷燈的鎊線和創製複雜的器具，例如顯微鏡，空幻鐘等等。

突擊隊員所寫的論文——是不少的了。全俄職工協會中央局現在把他們的論文出版很多，而已經出版了的也有一百多本。這些論文——是原料，金屬礦。然而在它裏面含備着不少高的評價的標記，從這金屬礦裏可以提出珍貴的和很有教益的東西來。大多數的突擊隊員顯然是不自認為文學家的，雖然有些隊員做這種工作的才幹是值得注意。

在機台旁，在各專門工場裏，他們的基本的英雄的事業或許仍沒有給予他們文學這一個部門工作的可能性，然而從它們所已給予了的，我們的批評家就可能在關於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底問題上，引出一些最有趣的推論，——對這問題，專門的書獃子所領悟的思想和一切口頭辯論是難以相信的惡劣。

青年文學家，尤其是那些多少適當地寫了兩三節小說，就裝腔作勢，已自認為文學的熟練技師而完全停止學習的，——這類文學家也不妨讀讀和思考突擊隊員的書籍。不久會這樣勸告他們當中的一

個，我接到他熱情的答覆：他說他的「創作不需要急迫」，他「已經有充足的學力來向淺學者學習了」。這個從普羅列塔利亞出身的少年應得到幾句墓銘話，因為他顯然是不能幹的，也就是沒有生存的能力的。他的派系和階層的人們應該知道和記着，突擊隊員——這不單是個很好，迅速，有紀律地學習工作的人，並且還是個能對勞動世界敘述自己經驗的人。

現在，請想一想那種力量的意義吧。那種力量能使人將無形的物質構成有形，同時用實辭形成克服物質對立的過程。在這裏就要想一想和描寫什麼了，因為問題是講到關於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有組織的意志不單是反對鋼鐵的頑固的鬥爭，而且主要地是關於活物質的對立，這物質在人的形態裏不是永遠成功為有組織的。

在突擊隊員的論文裏，可以讀到關於青年怎樣把老人返老還童，關於保持着惰性的懶人怎樣灼傷同志的手；可以知道，為什麼有時候老年人還比青年人年青，而且一般地知道關於許多很有教益的「創造的」現實。

我們都嚷着：接近現實吧，接近啊！然而在共產黨青年團大會上曾經有三個文學家，都是——女共產青年團員；對文學暗害者的作用，他們是一致地注意的，而蘇維埃大會，他們好像完全不注意似的。然而蘇維埃大會——這是很明顯反映新現實的一種，共產青年團——是現實，而且是很好的現實！暗害——也是現實，這種現實的醜惡也是非常有效訓的。——同志們！傾耳聽吧！張開眼睛吧！

——現實是教育我們的。

必須知道，我們目前現實的名字——就是革命，而它很迅速地發展着，容易地超過有思想的人們，把他們遺落在後面的。

一九三一年。

註一：這篇文章是「我們的進步」雜誌下一期的序言。下一期是編集突擊隊員所寫的論文。

論工作的不熟練，疏忽，不忠實等等

「青年警衛軍」出版社印了一本名著，白倫麻著的「動物的生命」。這本書是在這樣的標題之下印行的：

波尼斯克教授主編

白倫麻著

約斯維支奇
格廉密支克 校正

「動物的生命」

下面選排印八個字：

「業經國家學會認許」。

向那兒「認許」呢，——沒有講。我們看看它怎樣「認許」吧。我的面前放着這部書——「動物的生命」——第三卷。蘇聯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二位公民沒有商量好應該怎樣寫：Razob (與萬

（呢還是 *Pizzini*？）（這兩動詞同一意義，不過文法上有完成體與未完成體之分——譯註）他們這樣或那樣寫這個動詞。這對於識字的人當然沒有什麼。這些人們關於動物敘述些什麼和怎樣敘述，對讀者是重要的。

對於金蟻熊，還添加一個完全多餘的名稱——小蟻——並認它是「有袋動物中最美麗的」，他們這樣寫道：「這動物特別活生生地給人以愉快的印象」。這樣，讀者就知道「美麗的動物給人以愉快的印象」，然而「特別活生生地」是什麼意思呢？

特後：「咬得這樣痛，甚至土人也不敢把手安放在活的動物身上」。這裏「甚至」這個字眼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土人「安放」自己的手來刺傷其他的動物嗎？

袋鼠有「一條被毛密密遮蓋的長尾巴」。這條毛茸茸的尾巴使人懷疑「修改」白倫麻的書的公民們是否識字的。再下去，懷疑是增大的。

關於田鼠，我們知道「它把生命耗費在不斷的掘土裏」。它不睡覺，不喫東西，而「不斷地」掘土。大蝙蝠用「有力的桌面」把根掘出。「它的行動遲緩，但持久而有力。」如果扼着它的腿，它就「顯出很狂怒而且斷然咬你」。難道有不斷然咬人的野獸嗎？

關於食虫，讀者知道：「食虫並不是先把獲物殺死的，而是一下就開始把獲物活生生吞食的。否則，它不能用牙齒咬的。這些牙齒一下就插入獲物的身體，而鋸齒，大家知道，常常是很脆弱的

東西。」

地鼠：「人不能從這些動物中抽取直接的利益，只剩下地鼠帶來間接的利息。大概古埃及人已經知道這種利益，因為他們把地鼠的一個外體塗以香油，和自己的遺骸一同埋藏。」你看在蘇聯讀者中間「業經學會」一認許「使用多麼蠢笨的話。」

「鼯鼠有洗濯杵型的物體，」——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公民宣稱道，在這裏證明他們只看過一種最不普通的形式洗濯杵。因為，照他們的話語：「杵是長度同樣的直徑的物件」，實際上最方便的和普通的杵却是山柄伸到尖端。「由于鼯鼠的形體永不能壓附在豎坑裏，所以多少須繞轉自己體的長軸心，無需再掘土。」於是辯論所說的關於這個同一的直徑，這無意味的作者說道：「鼯鼠的身體前部比後部肥厚些。」

關於齧齒類動物，這樣說：「它們很輕便地在垂直的斷崖上面爬來爬去，似乎並不要抓住什麼似的。」「極易分別大小的雌性是生蛋和發出特別聲音的。」在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看來，跳躍的齧齒類動物：「不獨腳骨，而且這些成年的動物的體內的一切長骨都沒有骨髓。」那麼，幼體的骨裏就有骨髓嗎？

關於野兔，這樣說：「野兔奔馳之速，良駒也莫及」。雖不能說它們是太懦弱，可是它們並不是靜的和卑怯的。「如果看見在相當距離奔跑着的小獸，那麼可以用武器放射的子彈來取它」。約

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的眼光最尖銳的：這些公民甚至看到「以武器射放的子彈」。

關於小鼠，他們這樣敘述着：「小鼠一歲時已經自己建築滿意的精巧的巢穴，並在裏面休息了。它們在自己壯麗的掩護裏一直住到有感覺為止。」讀者有權利看到：首小鼠會建造精巧的甚至壯麗的巢穴！

講到海豹，寫得有趣（三二〇頁）。講到鯨魚也同樣有趣：被追捕得疲勞的鯨魚停止不動了，並「開始滾入波浪裏」。（三四八頁）。在三五八頁上寫出從某處關於獵鯨的故事，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增補自己的意見：「狩獵順利完結，雖然牧師和幾個懷孕婦女從岸邊上注視着它」。這裏「雖然」這個字使讀者有權推論到牧師和懷孕婦人對於捕鯨手藝做得「不順利」的。

抹香鯨「因站在可能的邊沿上的不均勻而驚恐」。「有一次，抹香鯨碰着船，碰擊得如此利害，以致在狂亂中滾倒在波浪裏」。

「香貓——是猛獸，貓種，——在肛門孔裏有很發達的帶着圓瞳孔的分泌管。」

喜馬拉山的熊有「長達二公尺的牙齒」。

「卜伊爾是馴子的最高學府，——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確信着。啊，公民們！難道只有一個卜伊爾！」「騎驢旅行卜伊爾，要經過一羣羣騎者和獸類」，——經過，而不是穿過！「布爾喬亞國家把驢馬束縛在政府的軍用車上。」

「野牛被人殺死後，被作種種用途」。關於辛明特爾斯克的牡牛，說「它們的乳汁質比那些顯得低地嶺的牡牛乳汁差得遠。」

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具備着他們一切非常的淺學來喜愛準確，並且表現在很畸異的方式裏。例如，在六七五頁上他們做出這樣的註解：

「白倫麻所描寫弗弗的特性，瀰滿着個人反感的粗暴和奇異感。我們將這性格放在很柔和的形態裏。」

讀者們可能責罵我：指摘愚鈍的太多了！可是在有六九五頁數的書裏，幾乎每頁上都排植着愚鈍。我自認很知道我們出版者的工作的疏忽。單用淺學來解釋這種疏忽，是不能夠的，因為疏忽常常引起顯明的不忠實的印象。

然而在我們這裏會印行了的和現在仍印行着的一切談話當中，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的工作特別顯得恥辱。書裝璜得很好，但他們把白倫麻優秀的，簡明的原文毀損了，彷彿是「嘲弄人們」似的。我不懷疑，約斯維支奇的改作將被工農政權的惡徒和敵人當作節目一樣歡迎。然而，不用說，要點不在於休息的人們的吃吃發笑，——要點乃在於我們的出版家好像要在蘇聯讀者面前更加減低責任感似的，而這個有自己沉重的生活和英雄的工作的讀者，在我看來，就應該受到從「作者」公民方面對他的最注意和尊敬。

在這醜聞的事裏有一樁奇事：和鳥類有關的「動物的生命」第二卷，被約斯維支奇校正得更通順，而上面所引證明的一類荒謬在第二卷裏幾乎沒有。約斯維支奇豐富地和勇敢地利用了孟斯彼爾教授最充實的著作，閱讀了卞戈羅特夫和其他的書籍，這些都很好地幫助他釋藏他的粗陋語言，釋藏他對俄文文法的疏忽和其他的錯誤。爲了寫第三卷，寫「哺乳動物」，他可以利用根據研究動物生命的許多新史料的，但他因爲某種原故也沒有利用。爲什麼呢？因爲淺學，疏忽呢，還是因爲對讀者的利益不忠實的漠視呢？

第三卷的緒言，顯然是波尼斯克教授寫的：這是一篇好的解說論文。但容允我問問波尼斯克教授吧：作爲主編的他，可會閱讀了約斯維支奇和格廉密支克的原文沒有呢？「國家學會」可會閱讀了這些被它所「認許」的書籍沒有呢，——「認許」些什麼呢？

在我面前有幾本一九三一年「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印行的書，是被該出版局縮編的。例如，亞歷舍奧古羅夫的「下馬」。作者在短序裏宣稱：「在作者自己的小說的原則上，有多少關於下馬的都是很準確的。由於缺乏適當的材料，絕對的準確是不能得到的」。

在把原稿交付印刷所之先，編者必須細心閱讀它：我敢對你們斷言，編輯公民們，這裏就是你們的責任啊！如果「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的編輯閱讀了奧古羅夫的原稿，他就確信過去的著作毀壞了

革命者下馬的形像，這革命者曾擁有近番傳奇的大胆，曾經是個非常的老手，幸運兒，同時有著孩子
的天真。奧古羅夫的「歷史的準確」是不真實的；他不會知道，下馬在柏林的莫亞彼特斯克監牢裏怎樣
講和講些什麼，和在格爾白爾克的精神病院裏怎樣對精神病醫生假裝瘋狂。下馬本人不懂德文，也不
能知道醫生詢問他些什麼，而根據奧古羅夫的書，醫生們詢問下馬時是沒有通譯員的。材料缺乏是不
確實的——下馬在一九二二年寫作自傳，而且寫得很多，——這材料大概放在他的妻子密特維借哇那
裏。總之，在奧古羅夫他所自誇的小冊子「歷史的準確」裏，不，代替它的是幾個為所有老祕密工作
的革命者所熟悉的關於下馬的故事，這些故事是複雜的而且已遠離歷史。下馬型的人們還沒有他們的
史蹟，而類似奧古羅夫的人們也沒有力量寫它。除了關於下馬的故事外，奧古羅夫還揭載了自敘傳的
論文「歐俄北部共和國」。在這篇論文裏作者寫盡許多英雄事業，其中就有用指甲從受傷的皮膚底下
榨出彈丸來的。這兩本著作和藝術文學毫無相同處，它們被「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的編輯根據只有
他明白的想像包括在文學裏，然而那是勉强的呢！無論如何，編者必須知道，這個「下馬」是誰，而
且不應該發行那種把下品的卑俗小說裏的勇敢青年的性格賦與革命者的小冊子。

其後，「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出版了伊奧西夫蘭特斯伯爾戈所編纂的小冊子「偉大的詐欺師」
。在這小冊子的序言裏，有位舍爾戈亞銀絲夫宣稱這小冊子「沒有缺乏主要的缺點」，這宣言使編

者不得不退回原稿給作者，爲的是使作者或除去主要的缺點，或把缺點變爲不主要的。其次，在序言裏說道：「我們的電影界是不平靜的」。爲什麼在電影界要平靜呢？電影界，和其他的一樣，不必和墓地相同的。這序言引起「爲着友誼的職責」而寫的印象，正是這類序言在我們這裏是很常寫的。好的古句語被遺忘了，例如：「你，柏拉唐，是我的朋友，可是啊——真理珍貴些呢」。仿做着我們那些愛引證的人們，我稍稍歪曲這句俚語，這就爲着要提醒大家：「壞的例子是傳染人的」。

「偉大的辭歌師」文集被稱爲小說，但和這形式是沒有相同處。這——是一個電影女優的日記，她想做「銀幕明星」，但憑她舞台經理和其他高利貸者不允許她走向這高目標去。被蘭特斯伯爾戈的語言描寫了自己的失敗和憤慨，爲着專門的惡意的人的歡心，她訴苦着，用暗淡的顏色描寫「電影界」。從這小冊子裏只能做出一個結論：即蘭特斯伯爾戈知道一個失敗的女優，他認爲她是能幹的，但他不能夠給讀者指出她正是這樣的女優。用易於動人的贊賞，可是不豐富的感覺來對女失敗者的憐惜，他寫成了最無天才的書。著作這樣的小冊子——是不難的事業，在我們這裏有幾百本書寫出來了，許多作者這樣習慣於這容易的工作，以致每年消耗數千噸的紙張，帶給工人階級的國家以物質的，而且文化教育性質的最主要的損害。

在蘭特斯伯爾戈的小冊子裏，有一些細目，它們可以作爲重要的摘發的文章材料，但是時時並不像純文學的實習那樣快使人成名的。這些細目是被口頭的塵埃閉塞了。這小冊子的「一般內容」爲

學是不可捉摸的，而且很難提出：我們創造新現實的讀者大眾從這作品中能汲取什麼呢？

我們缺乏紙張。因為這樣，「國家圖書出版局」的五年計劃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沒有完成，而且在一九三一年也沒有完成。依照計劃，在這些年內必須出版大批最有價值的外國和俄國文學的書籍。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出版了幾十本計劃以外的書，而它們大多是沒有被確定的。出版上不必要的甚至無天才的書。「國家文藝書局出版局」在一九三二年出版了些什么呢？亞美尼亞作家翻譯社要的小說——「死亡」，寫於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在這書的序言裏詳細地敘述書中的英雄是個「社會衝動發展得薄弱的，意志薄弱的，無力的，不活動的，神經衰弱的，喜愛自我分析的，困憊於精力的，懦弱和無判斷的人」。這人物是很熟悉的。西方和我們的文學從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起就描繪過個好男兒的畫像：第一個描寫「無判斷的人」的畫像特別成功的，就是斯祖連爾。歐洲和俄國幾十個偉大作家模仿他。這百年間燦爛地作為主要的文學題材就是青年的冒險生活的描摹，這青年或多或少地畸形擴大了——肥大了——他的「自我」，但他沒有在小市民層的生活環境裏找到舒服的地位，他也沒有企圖改變這些環境的力量和願望。

娜爾杜斯的小說給我們指出，這沉鬱的典型對於亞美尼亞的文學是很熟悉的。這本小說的文學的歷史的意義是無可爭辯的，雖然這本小說並不好；也許這小說這樣不好，是因為翻譯得壞。假我

們近年來一般所做的外語文翻譯的工作一樣。娜爾杜斯的小說被編纂了。在一頁上就碰到這些笑話，例如：

「一，二，三，十天過去了」。「這樣過去快兩星期了」。「再過幾天後」。有這樣的註解：「該語的意義是不能翻譯的」。編輯顯然不知道，沒有意義不能譯成任何語言的諺語。「玩弄字句」是很難翻譯或簡直不能翻譯的。

保加利亞的阿斯登齊涅夫所著「富地主卡儂」一書被「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印行了。序言推薦它為保加利亞文學「最通俗的書」。如果這是真的，這就是很可悲的了。然而在哇索夫，斯拉維克，杜都和其他天才很高的人們所工作的文學裏，這本書是通俗的。那麼就有點不相信了。此外，「關於趣味，他們是不辯論的」，或許我的評價是不適合的吧。可是關於我們這些書適時出版的問題提出來了。我們的出版計劃，我再說一次，在一九二九——三〇——三一年出版大批的世界文學作品，可是我們耗費紙張印行這些無天才的書籍，例如，德蘇爾莎列費佛拉的「我是流浪人」，蘇爾莎大衛特的「行列」，康古樂夫笨拙的模倣品「格廉銀古爾斯克的門閘」和許多更空虛的書籍。在翻譯裏通常是這些真珠和金鋼石：奧布都梳：「在波蘭的樹林裏」——「櫻桃透過麥稈」，「一束麥稈」，「牙齒出血了」，倫格爾，「海的呼聲」——「逃兵——紐西倫的野人種」；康拉得，「Боевое」——「自己哈哈大笑」。

差不多在每個外國作家的翻譯裏可以挑出這些和類似的不通順，疏忽——一般地不忠實的工作的實證。出版社的編輯們做些什麼，忙些什麼呢？究竟他們是誰呢？爲什麼他們是編輯呢？

把紙張來印刷這些書籍是耗費的。例如：杜爾克的「同盟」「變曲」——這是極其可恥的無知的，差不多夢想的，而自負的關於天才畫家的故事，這畫家彷彿生長在現代，可是住在空中樓閣裏。

隆特齊德昔的「織匠」——是很壞的，無助的論文，彷彿從某人那裏寫出來似的。作者沒有自己處理題材的態度。

安尼巴爾的「時間，事業，人們」——是萎凋地，皮相地描寫工廠的作品，在這裏，作者沒有用神話學的知識反映鄉村和城市。」

拍夫樂夫的「深藍色的岸」——是模倣亞維爾切克很拙笨的作品。

斯密爾涅夫的「在沙灘」——這是很學識的作家，可是他生活在離開現在，真實和新現實的某一個地方。在他的小說「刈草人」裏，怠惰者，饒舌者把少年農夫的少女毆打了，那少年就毆打這個饒舌者。在小說「英雄」裏——英雄抽出兩個老人的工作並譏笑他們。英雄的工作能力低落了，這兩位老人就放棄恩俸，再回去做從前所辭去了的工作。

我能够列舉這些空虛的書不只十本，可是不值得列舉的。應該注意，我們這裏有了廣大的人羣，他們從現實中採取奇聞趣事，這些趣事已經沒有現實的特徵了。他們把它或多或少地構成嘲笑的音調。

，並對自己的懷疑主義的愚昧，賦與絕對的自由。這些詐騙是那些自命普羅作家中許多人所轉動的。有些人的懷疑主義和愚笨的醜態顯然是其于自我批評的自創的理解意義而產生的，它們不外是作爲奴隸地忠實於所處理的材料的工作人員。然而自我批評，這——是從願望者的視野所創造的批評：自我批評——傾向於完善，正是這樣的代表他們創造社會主義革命的前衛的，活躍的工人大衆的自我批評。這大衆是不怕被它所改造的材料，它不是受材料束縛，而是從材料中塑成自己所欲的形象。這大衆感覺，思考，工作，和創造人類新歷史的整個的，堅強的力量一樣。

忠誠地熱戀於革命的工人，不獨是理智地愛革命，而且也以自己情感的一切力量來愛革命，像他愛婦人而不自對她的性格的某種沉重的矛盾的特性，要求的嚴苛，我們可以說，甚至有麻斑的面貌一樣。我覺得，我們的情感，甚至我說色情的傾向的作家大多數是以自己的力量來授胎革命的——由于理智和首先注意他的麻臉，她的要求的嚴苛和她的不適於他們個人的特性而對她不感到冷淡。他們正將這些來糾正一位哲人，格爾拉克列特的思想，這位哲人確信，「人是不理智的，只有過國的環境才擁有理智。」

在現代，大衆在革命上是比個人活關得多。我覺得，編輯公民們是應當注意大衆的要求和心情的時候了。然而研究它們的心情不應該根據調查，不應該根據多數讀者關於書的口頭陳述，因爲我們的讀者目前還是口吃的，還是多半用別人的字句包裝自己的思想的。研究它們的心情，必須根據他的讀

極的社會活動的總和。我們的讀者非常渴望着整頓，他吞讀着出版社所給與他的一切讀物，他購買百萬本寫得不通順，乏味，拙劣的書籍。這些拙劣的藝匠的作品吸取了大眾的空閒時光，閉塞了他的頭腦，而斷不能增進他的文化成長。

顯明，只有給活動才知道時光。這種真理即使螻蛄也知道。當鐘錶停止不走的時候，就同時地指滿那個時候；在這狂亂裏，鐘錶完全和頭腦相同，會被某一定時間的塵土閉塞的，注意它，它就停止不走了。很難明白，蘇維埃出版社的編輯們的頭腦活動的發覺在什麼時期內停止了，然而他們的工作和川流不息的現實的革命文化的真價，和那激動讀者大眾的智識的渴求，都很少有共通點。在集體農場裏百萬的讀者很快地成長着，他們明白需要學習些什麼，他們要知道過去，為的是要避過過去的傳染性的影響，他們比市民還擁有較多的空閒時間，並且有良好的購買力。

我們的出版社工作的紊亂，無計劃，而它們的工作使人會想起革命前時，那時候書市場全操在斯琴，耶柳廣莫夫，蘇維埃和其他書商之手裏，書籍只當作商品，和其他的貨品：巴威的汽水，醬，糖，麵，蛋糕等等一樣。

在「國家圖書出版局」的工作裏，也顯明看到無政府主義。我知道這些事實，例如：出版敏特林的「城市的誕生」一書還比書中所描寫的蘇聯城市要慢得多。「古典廉價版」的雪萊的小冊子，印了二十八個月。考氏比亞的書「李爾王」(King Lear)和「凱撒大將」(Julius Caesar)每本四頁裏印

一本印了十六個月，另一本——十四個月。精裝的古典作品的預約版，可以作算到即時的銷路的，迄今還沒出版，甚至還未交到印刷所去，雖然原稿放在作品部的書櫃裏有一年左右了。書本質上變壞了，因為新的補充材料出版了，合同滿期了，損失的總數也抄寫出來了。

「國家圖書出版局」和其他出版社的紙源——三萬萬八千萬頁紙張，用在國家的全部藝術出品上——這比少還要少，而三月裏已經把這年的計算率縮減到一萬萬三千萬頁了。不受「國營圖書出版所合同」約束的出版社對紙源的統一規格的不完全和隨便態度，都使編輯所製作的無瑕疵的作品，停放在「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的不活動的紙夾裏，而沙皇檢查制度所歪曲的，可憎的，不通順的同一名稱的書，却在其他的出版社裏出版了。「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不能出版巴爾扎克所寫的優美的書。而現在都威脅到這出版的本身存在了。然而「赤色報」把這著名作家的小說一本本用劣紙印行大量的冊數。「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從「國家圖書出版局」的「文藝部」那裏繼承了白蘭舍（法國詩人，有名的革命詩作者，七月革命的參加者——譯註）優美地所寫的好的預備出版的書，並企圖了四次出書。被拒絕了，因為當時市場上出現了那「赤色報」古譯的裝楨得很壞的白蘭舍的書。「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不能印行莎士比亞的。然而「赤色報」附印了莎士比亞的，即使多少「整理」一下原文都沒有顧到。列甯格勒的「學校叢書」準備出版斯皮列下根關於拉勃爾的小說「獨自在無戰爭的戰場上」的其他的縮本版。缺乏紙張來印行這本書，而「赤色報」很完整地這小說用厚紙裝楨印行，似

值一盧布，全書有七百頁。在「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裏，商議大量出版古典作家的書進行了四個月。迄今還沒有出版福樓拜的作品，然而那「赤色報」沒有審定原文就計劃出版兩部福樓拜的銷路很廣和迅速的小說，這就是「布哈爾和白舅沙」和「教育的感覺」，因為某種原因而被無知地標題「情感的教育」。

這目錄以無盡地繼續下去，可以發見書列完全不必需的參考書，類似參考書五百十二頁的「莫斯科一覽」或「列甯格勒播音良伴」，這目錄可以無盡地繼續下去，而以小火花叢書的二十四本小說來結束——這企業需要具有十萬和六十萬冊數的巨大紙費，遺憾的是，損害「國家圖書出版局」古典作品的五年計劃，給與讀者不十分好性質的材料。（註一）「小火花」計劃中的較好的小說印成了非常粗陋的縮本，這縮本沒有得到任何方面的認許。

例如，柴奧菲拉戈齊耶的「法拉克斯隊長」被節縮了三分之一，斯紐達爾的「巴恩修道院」被節縮一半等等。如果要比較適合時宜地實現「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所計劃的程序，就要把「小火花社」的工作人員的能力和敏捷團結到這裏來，他們的技能會完成製作的過程和閃電一般的迅速把書推廣佈各地去。

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不應容許這些「雜誌」的，如「蘇維埃的行進」，「自然與人類」，小的「小火花」總共印行四十萬冊，然而它給與讀者些什麼呢？它和「赤色地」有什麼區別呢？我們有許多

相同的刊物了。究竟，一切分門別類的雜誌是必要的嗎？還可以提出一串這些問題的。

出版事業裏的無政府狀態必須中止了。除了無益地耗費紙張外，它還製造幾百個無用的人們。這些人們喜當容易的工作和愛嗜文學家的品級，然而他們仍不是文學家，他們暫時還不能獲得這品級，因為他們是淺薄的，漠不關心的，他們工作得疏忽，甚至不忠實，顯然他們不覺得，願望是比他們好過的。如果他們不成爲好些，——工人階級，蘇維埃政權會在他們的面貌上存柱上得到自己的幾十個甚而幾百個不公認的英雄，訴苦者，憂鬱者，「下賤的和犯罪的」，惡意的，總之，無用的人們。他們必須學習，也必須教他們。工人階級有最合法的權利對自己任何的個體提出最嚴肅的要求。它向着尊敬的革命戰士，向着老黨員，提出這些要求。它不能有任何理由跟那些已變得類似後補寄生蟲的人們客氣的。

「國家圖書出版局」的任務——就是社會教育的任務。如果是這樣，必須依照既成的嚴正的計劃出版書籍。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發務地把反對「自私」，和「自利」的醜惡的擴大，反對被布爾喬亞社會所飼養的寄生蟲的「自我」，和慣於把自己「心靈」的「私有財產」的利益抬高過世界的利益，勞動大眾的利益的鬥爭，放進自己的大衆文化計劃裏去。

在我們壯健的和英雄的而仍不是有組織的生活狀態裏，在我們的建設的混亂裏，都還沒有把那羣環境消滅，在那裏發展着小市民的「私心」的疾病。我們的青年仍很容易感染小市民的這種疾病。我

們是生活在不輟戰爭的環境裏。「戰爭產生英雄」，然而戰爭產生英雄，不過因為戰爭是大衆的積極的活動，而英雄常常從大衆裏產生出來的，他是大衆力量集中的焦點，它把能力反映到大衆中去。這——是鬥爭的辯證法。

哲學培養這智力，但很壞地影響社會情緒，影響個人和大衆聯繫器官。哲學家特別地把自己描寫成超人。批評呢？批評大概也這樣。批評家想像着自己是大教師，而這些教師是很多的，這些人們教的時候，就忘記自學的必要了。他們過於常常由于所得到的智識的口頭喧嚷而變得耳聾，由于他們很快地所採取的思想的俗體而變得盲目。這是很有賴於我們的批評家了。

藝術文學的教育意義是巨大的。它因為同時和同樣有力地影響思維和感覺。正須着藝術形象的影響來解釋這事實，即影像對大衆之影響常常比禱告還更加有力些。

這裏從所說的得出這樣的實際結論：爲着反對「私有」的痼疾，反對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的順利的鬥爭，必須把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的歷史給與我們的青年讀者大衆。這歷史，悲劇的，和喜劇的，——「惡喜劇」的歷史，——被歐洲和俄羅斯偉大的藝術家燦爛地寫成巨大的和說服的力量藝術形像了。

「國家圖書出版局」必須編印有關於十九世紀的青年的叢書的分冊。這些書對我們患了「自私」的疾病的青年指出，他們的祖先體驗些什麼，他們耽溺於怎樣的泥濘裏；明白地指出，即使是有天才

的人們，爲了保衛自己心靈的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而怎樣地生活得沒有興趣，死得沒有意義。

一九三一年

註一：

我參與這小說叢書的出版工作，只編養了書的目錄。

論不負責的人們及論今日的兒童讀物

最近蘇維埃報章會公佈那些惡徒們的口供，他們在自己面前提出一個卑鄙的目標：便是把勞動階級出賣給資本家政權，用種種方法到處搗亂，而那裏有可能就毀滅勞動階級農業的，社會主義的建設。資本奴隸犯犯罪工作是有一個「功績」的：就是這工作沒有被「意識形態」掩飾了，沒有隱藏在耀亮口號裏；奴隸和騙子聲辯得很簡單和坦白：我們奴隸們靠着地主生活是舒服些，所以我們奴隸們必須盡力使地主復返家園，再壓迫勞動階級。然而顯明地，勞動階級對敵人是更有靈敏的嗅覺的。破壞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柏利斯基，不得不在自己武裝同伴面前自認道：

「破壞是不可能隱藏工人大衆的，雖然他們不自覺，但常覺得人造的阻礙物會妨礙事業的發展。」這像，要在那個部門裏才有破壞，在那裏工人就是主人並立即站近事業。工人站在事業最中心，已然不像先前一樣只作為謙恭地執行主人命令的體力，而自己——就是事業的合法主人，自由地把自已的理智，思想和才能底一切力量帶進事業中去。

勞動階級政權支配國家，到現在已經是第十三個年頭了。無需誇大事實的意義，可以說：如果工人是自覺的社會主義者，實比過去的俄國資本家是更大的「公務員」，那些資本家在自己的事業裏，

在爲着自己利益的目標而奴隸國家的檢閱事實裏也是很能幹的，——顯然地，這目標是被「餉養勞工人民」的必須提佈了。

然而工人不獨在本國的發展生產力和方法的事業裏，——並且在文化發展的部門裏，都比資本家是更大的「公務員」。他必須這樣。常有爾喬亞只重視鞏固自己的「外表修飾的文化」的時候，他創造着智力自由的新文化。

這裏要說的，就是在文化部門裏工人仍不是主人，在這部門裏他仍沒有像在物質價值的出產裏這樣地接近事業。這裏供給他的需要仍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而是別人的力量。在他們當中，正如在農業專家和技師當中一樣，暗藏着不少的人有組織地仇視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關於這個，已經寫了許多，而且現在還寫着講着。這是一切有深思的和忠實的人們所深知的。而這仍須重複說說。

惡徒們是些什麼和做些什麼，這無需證明了。從這些昆蟲當中，對蘇維埃政權，對勞動階級各種虛偽的和誹謗的工匠和製造者都產生出來了；白俄僑民報章從他們當中招募着原告和「告發人」，即誹謗。我個人覺得，這類「惡徒」是不如他們自備那樣地危險的。

更爲有害的，就是那種不自覺的惡徒的典型。他們被「布爾喬亞文化的生活力，它的柔韌性，百年的教育訓練」驚醒了，就憑空地整個地反對布爾喬亞文化，而忘掉列寧所給予的真正勝利的文化的那種高評價。「我們不拒絕布爾喬亞的遺產」，——他曾說過，不會一刻鐘忘記，這道

產最後靠着勞動階級的能力創造着，因此成爲勞動階級的合法遺產。

我覺得，我的那些厭煩布爾喬亞文化的通訊員們，都過於把今日文化的健全狀況歸咎於「生活力」只可以明白組織能力怎樣抵抗那粉碎它的影響。然而歐洲布爾喬亞的「社會組織」明顯地而且更迅速地失掉這種能力，布爾喬亞的文學和新聞學每天不安地嚷着什麼。有文化的歐洲人實在擁有一「柔韧性」，每天各種誹謗也可以證實的。這是例子：

「柏林、二月二十三日。

「里浦齊格皇家法庭刑事檢察官對於古魯伯和齊仙商號經理叛國的起訴給與訓令。工廠經理被控告下列的事實，古魯伯廠將一種德國的專賣權 (F.H. KAUFGEBRECHT) 出售與英國維克爾莎廠。致使維克爾莎廠有可能在戰時製造同樣型模的機彈，像在德國機廠所使用的一般。只不過這道合同是在戰事極頂時簽訂呢抑這是在戰前不久？然而即便在最後一種情況下，這專賣權的出售已構成叛國罪了。

「由於這專賣權，英德混合法庭已判斷古魯伯商號和維克爾莎的訴訟。古魯伯要求維克爾莎補償關稅，法庭判定維克爾莎公司付給古魯伯每一炸彈一個先令，合共總數一萬萬二千三百萬馬克，總數目錄入古魯伯的帳書裏。

「但如果沒有完全確定出售這專賣權的歷史，那麼機彈和軍器經中立國出售是不使人懷疑的。古

魯伯公司出售礮彈給中立國，據聞它們是準備供給聯軍的。

「齊仙公司有系統地將荷蘭礮彈賣給同盟國，這公司仍然知道它們（礮彈）要到那裏去。齊仙將這些子彈賣給同盟國，每塊值六十八馬克，同時從德國政府採取一一七馬克。如果古魯伯和齊仙公司經理將自認有罪，他們將被判以十年苦工。」

這事實完全暴露現代布爾喬亞可怕的「柔韌」。「自己祖國的愛國者」，「祖國和民族文化的保衛者」——德國人爲着要毀滅德國工農，就將槍彈用半價賣給自己的敵人，也是「愛國者」，「民族文化」的保衛者」。他們減低子彈價格，簽訂合同，都是爲了保衛自己德國的「祖國」，自己德國的「文化」。這是這樣「柔軟」，一個幻想的問題就發生了：也許資本家先生們不是爲市場而開戰，而只爲殲殺數千萬工農吧？不用說，——這是坦白，天真的疑問。因爲只有「無文化的」，「愚昧的人民大眾」才會想到「當權者爲了殘殺人民才引起戰爭。」

但是怎辦呢？當聽到一個德國人，軍火製造者，教自己的工人大聲喊：「上帝啊，懲罰英國吧！」的時候，然後又知道這個德國人用半價使和他自己一樣的英國資本家可能殲滅德國人，——比較這些事實，你看不見資本家犯罪的邊沿的，你要憂鬱地驚詫歐洲普羅列塔利亞的長期厄難的。

布爾喬亞「心理學」的「柔軟」完全是奇異的，然而受痛苦痙攣震懼的器官表現着這樣的柔韌，頭部受足踏着的蛇也能表現着這樣的柔韌。聽了和讀了文化崇拜者的意見，就覺得他們把文化理解爲

適應外表世界的總和的。這——純粹是庸俗的理解。列寧講到勞動階級承繼勝利文化的權利時，他以為不只承繼便利的廁所，而且最主要的是承繼文化和科學，利用它們的力量來創造城市渠溝排水法和其他等等。這些不獨作為保衛人們的身體健康，而且也作為保衛人們的精神健康。

給你提這個是有點厭煩的，公民們，但又有什麼法子呢，如果你們是這些討厭，弄腦和胆怯的人們？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可能提出這些疑問：「要戰勝文化敵人，必須在文化上——精神上——強逼敵人的——你相信勞動階級這一點比資本家強過嗎？」不用說，這是彈子和賭子的疑問。而蘊藏在這疑問中的懦弱，或許會被僧正和主教研究齊伯和古魯伯的噴嚏所喚起的。

在現實新氣象面前，你們獸性的懦弱會使人估計你們是勞動階級的不大危險的敵人，雖然你們企圖要用自己的清性感染個別的人們。最危險的，就是從你們當中那些「拿筆桿」的，在報章發表自己的談話的。我認為「你們有些人實在害怕勞動階級不感染小市民的傾向和習慣似的。但怕感染以前，據說你們「從澡盆把水潑開，同時將小孩拋在邊沿」，——你們，將文化概念，將文化過程的複雜，都過於簡單化，省略化了，就增重困難來發展文化的興趣和意志。在你們當中也會經有過——而且仍沒有消失——「消滅文化機構」的宣講者。這種說教只能解作爲阻滯勞動階級文化成長的過程的有意識的傾向。

這些仿做「法律條文」的，不覺得和不理解它的「精神」的人們，必須列入這羣惡徒中。可能地

，他們不想或害怕理解自己怠工傾向的精神，因為理解會使工作緊張，同時也跟着有責任。他們喜愛諂媚首長，雖然「首長」完全不想他們諂媚他，却要求合理的和忠實的工作。

然而文化工作部門內數量上最多的危險的惡徒，這——是小寄生蟲：利用建設的混亂，切望「選擇和疾走」或潛居在首要地位上面諂媚地污辱文化的人。這類人大都是沒有什麼學識，也沒有天才。不過他們很會採用革命語句，巧妙地掩飾自己的投機主義，掩飾自己的無靈魂的自私的狹窄實用主義。正是他們，他們藉口「自我批判」作為「自我行動」的工具，來改變它的社會思想，它的社會主義意義，並用這些來詞和自我批判。這類典型的人們叫做適應派，這街頭很被他們尊重，而這街頭完全和寄生蟲的街頭相等。蘇維埃機構被這類惡徒污辱得很利害，——像被無聊者污辱得同樣利害一樣。我們這裏的文化工作雖然是在光亮語句，但言辭的污穢正從這些惡徒方面發出來。

在文化創造部門裏，擺在勞動階級面前有一個很確定而顯明的任務：即熟習一切根據從前身體勞動所創造的無可辯爭的有價值東西，熟習一切服役，而且能服役於發展人類能力的——人類的智慧，想像，本能，它的創造力。任務——是為反對一切或明或暗地能阻礙這些力量的發展過程而堅決鬥爭的任務。「遺產」的真正的和無可辯爭的價值是包括在研究人類自然底，和研究圍繞人類的自然底科學裏。發見，發明的歷史、技術的歷史，它使人們的勞動和生活容易化，——這就是文化史。藝術，和科學一樣，最先是勞動過程，技術過程。科學的工作者開發，研究那刺激人類病血和器官的細菌。

他們做着這樣的工作，正如文學家觀察，研究現實，暴露惡徒們那些這樣或那樣阻礙和侵害社會「組織」的正當發展的人們一樣。

我們的創造世界的一切「偉大和美麗的」是從最細微的觀察中創造出來的。在個人和人類個體的活動底基礎裏安放著勞動大眾許多世紀的經驗。我們今日的藥劑是利用藥草的，它的效用是早在藥劑被製成爲科學以前千年的「民衆」所深知了。「世界的」文學典型是在「民衆創造」的基礎上——在小說，傳說，歌曲底基礎上創造出來的。

這是大家都知道，早就知道的，但很悲痛，很煩惱，這一切都必須重覆說了，因爲一些人已經忘掉了，另一些人却不要知道它。那些只聽到和看見一些的渴望的人們跳躍出來，他們彷彿用「新的」，可是空洞的語句說出來，並污辱着簡單和明顯的似的。這輕輕的話語使生活變得暗淡了。

一切生活現象都屬於一個最主要的：即智識和勞動的技術發展，爲新世界建設的必要的經驗堆積。這發展過程也是文化過程，——人們以智識和圍繞他們的存在自然來武裝和豐富他們自己的過程。勞動和智識創造「第二自然」，而它就是這觀念底準備的和真正的思想中的文化。

勞動階級在農業部門的工作上消耗自己大量能力，迅速地發展了工業和農業，却沒有從本身中將充足的力量推動到文化工作前線上。不僅「沒有推動」，而且彷彿不大重視這前線上的鬥爭似的。

在這類漠視的例子性質裏，可以引起議論紛紛，最近「文學報」副刊上所引起的。這確被引

是反對那些國家圖書館兒童部的工作人員，他們可以出版一部天才作的兒童讀物叢書。我們承認，這些書中有兩三本是失敗的。但「文學報」的批評家却武斷一切讀物都是失敗的，甚至是有害的，所有國家圖書館出版局的工作都是失敗的。

如果認為「要誠懇和兒童講」，那麼誰不否認這個，講到兒童教育的問題，就要絕對誠懇，却不要用普通的報紙文章，却不要用那些顯然不明白這問題的深奧和重要性的人們底論調。關於這問題，曾經這樣講過，「娛樂兒童的趨向——對兒童是無益的。」

我確認為——要「有趣地」和兒童講。關於太陽系，關於我們的行星，關於國家和人們底基本概論必須在遊戲中，玩具中傳授與兒童。對於最大的，重要的事業——對於在國家內社會主義者教育兒童的事業——這絕對有各種不同的態度的。這國家順利地傾向於組織在社會主義的原則上。但仍沒有組織成這樣的。完成這樣的組織，將必是今日的兒童，他們是生活在矛盾的環境裏，在社會主義的十月兒童和個人主義的成人（受千百年的教育的成人）底不輟的瑣細的，國民生活有關的鬥爭的境遇裏，——理解這個吧！

我確認為，必須把古魯伯和齊仙黑暗的罪惡告訴兒童，從中喚起他們對罪惡的本性藐視和厭惡，却不要使他們恐怖。階級仇恨正須在對敵人，像對卑劣型的動物一樣底本性厭惡上培養起來，而不是在它的假世嫉俗底，牠的殘酷底力量前面所喚起的恐怖上，好像革命以前感情的「兒童文學」不自覺

地所做了的一樣——文學絕對不能利用這殺人武器作為嘲笑。

我絕對堅信，敵人確是卑劣型動物，這——是身體上和「道德上」的退化者，墮落者。統計學家給予我這方面的罪惡增長的事實，精神病的事實，兩性墮落，——都是「戰後」時期布爾喬亞腐爛潰的無數事實。

我堅信，關於少年大衛獨戰高利亞夫（聖經中的巨人，被大衛用投石器所殺——譯者）的聖經故事，關於伯爾斯的傳說，和一切這類主題的故事，都曾經為兒童而編集了，敘述給兒童了，而且從兒童中培養出斯巴達，佛爾拉——杜列琴涅和其他革命家們了。

必須輕鬆地和「有趣地」將偉大發見和想像的歷史告訴兒童。這真實的人類歷史包含着許多離奇的戲劇，但同時也蘊藏着當權階級許多可笑的蠢笨和可憎的吝嗇。必須使兒童很好知道最有興趣的歷史——關於人們怎樣永遠地關懷着增強個人幸福，阻攔着全人類文化的發展，擁護愚民領袖的個人文化的發展。

偉大的物理學家法拉第曾經是個工人，在他的性格裏會有過可笑的，有趣的特性。這些特性必須顯露在兒童面前，——讓他們看見，「偉大的」人們也是「平凡的人們」。

兒童必須知道百萬富翁的畸形可笑的生活，上帝門徒——教堂主教的有趣生活。對於將軍的敗亡和追逐的有趣歷史，對於戴高帽掛冠冕的新彼得亞里斯基怎樣組織「十字軍」來反對蘇維埃兒童的攻

室和兄弟的歷史，兒童是要發笑的。必須將過去的惡習天才地和愉快地指出給兒童。「誠懇地」講到惡習，意思就是把注意「確定」——固定在惡習上。在惡習中多少是有點誘惑的，而對於誘惑的知覺力，在兒童中是有承襲自父母而來的「田地」的。社會的惡習，和可惜可笑的醜惡一樣，必須在輕鬆的諷刺的形式中被指摘出來。

以拙劣語言對兒童說教，這就是說，引起對說教主題感到無聊和內心厭惡，——這被革命以前時期的家庭，學校和「兒童」文學裏經驗證實了。

瞧瞧兒童，像臘蠟燭和黏土，像臘材料一樣，從這材料中可以將一切所喜歡的——老早已遺棄才來的——構成模型，這瞥視給出三種結果的簡略：大多數的兒童生成爲現實的無人格，不負責任和奴性的人；少數兒童分爲兩派：人數較多的一派供給了憤世嫉俗者和自私的投機份子，較少的一派——走到民粹派的浪漫主義革命中去。

兒童的特性是趨向明朗，非常，勞動階級的革命能力所創造的新的就是我們聯邦所有的非常和明朗。在這上面就要緊密地注意兒童，這必須是他們的社會教育的最主要的題材，然而需要述說這個，這必須在輕易的比較的形式中天才地，大胆地指摘出來。

勞動階級從本身培養和推出文化技師，同時尤須嚴肅地去專心地從他們當中挑選爲教育事業具有能力的人們。這些人們的特性必須是首先對兒童的摯愛，其次——是廣博的教育。

世界是要知道一切的。

對兒童要誠懇。要能夠告訴他們，說：我們，父親，仍然有些不懂的；你們，孩子們，來到這個世界，

不用說，教導兒童——是必要的事業，應當明白，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自己向兒童學習。

一九三〇年。

關於一個論戰

在法國作家中間熱燃着關於怎樣寫作問題的論戰。問題是極其重要，我們很熟悉而也沒有解決的，像關於伊利原克的小說「天軸」的喋喋的論戰就是明證。在法國引起論爭的是安得列布拉的書「每日的糧食」。批評家堅認布拉的小說寫得不好。布拉本人反辯這樣的批評，在一種答辯裏他引伸弗羅貝爾之類的言辭技師的書做例證，即是如果這類書不借助於辭典，就已不可能閱讀了。我不打算判斷這個答辯是否正確，然而我覺得他只能援引弗羅貝爾的這類書，如那有毒意的「聖安東尼的誘惑」，這是懷疑主義的鐘對教會和宗教的非常強烈的打擊。「薩郎波」可能需要辭典的幫助，這書無疑地也需要歷史智識。然而長篇小說「波華翁夫人」，「感情教育」，「布巴與皮古斯」，短篇小說「一個簡單的心」的俄文譯本都是很難把這些巨大，簡樸，清晰的結構表達出來，同時那不滅的有力的證實在技巧上也已經失掉了本身無可爭論的，有教養的意義。我覺得，布拉和他的徒衆在自已基本的和潛伏的思想裏對於推護權力的答辯，結果是做得不好的。

伊利原的小說——「天軸」的女英雄失敗了，正因為牠的材料被製得不好。我不是說關於小說，而是關於故意用壞材料做成的火車頭一部分。伊利原克——是能幹的人，而且我覺得，不能懷疑他是

用自已的小說企圖確認普羅作家們有權利疏忽地迅速地把印象變成材料的，倘若他們更快地「揮筆」和完成光榮神聖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頭腦的話。

伊利亞克，無可爭論地，是能幹的，但顯然他唯一的缺陷，幾乎和所有普羅作家相同，——就是智識的缺陷。如果我沒有算錯，那麼獲得和擴大知識的慾望底貧弱發展是造成這個缺陷的。於是這缺陷就迫使着我們的文學家擷取表面的，不思索的觀察所得來手頭的，無意識的智識，並且擷得了，他們就常常寫成荒謬的。例如，在伊利亞克的小說裏的「考古學從黏土裏搜集猛犸，白狐和馴鹿的殘餘」。——乃須知道，「從黏土裏搜集殘餘」在生物歷史以前不是考古學的專門事業，而白狐——是從獵的獸類，狗種，狐狸的家系，——未必屬於生物歷史以前的。伊利亞克又寫道：「術士在鍊金術的製方裏提取黃金」。「術士」——是幻想的產物——它進到我們的想像世界裏還是遠在真有煉金術家以前的，這就是說，術士不能應用那不會有過的製方，一般地也不需要製方裏提取黃金的。「千年沖積土的沙，和水」——這也是伊利亞克嗜着讀者眼睛的「博學的塵埃」；作者用接續詞「和」把時間和水的同一時間分隔了，他的水彷彿是在時間以外而獨自地流着似的。這些很廉價的，誇大的「博學」的事實，隨便從伊利亞克的書裏摘出不少的，而它們都沒有裝飾他的小說。

伊利亞克不很注意自己小說的創作「作風」的進步。他的「言辭創造」的價值是很可懷疑的。「膨脹了，恐怕了，」和數十個這些虛構得不好的字眼，這一切——完全不是陳，不是稗，而是有宿的

惡草——也是一種危險，就是它的種子給予豐沃的嫩芽，遏抑着我們豐富，多汁液，有力的文學語言。作者或者反駁道：「講的這些話，我聽過了！」在廣大的我國不論講什麼和怎樣的講，——文學家對於言語描寫的工作，必須能夠挑選最生動，清楚，簡樸，明朗的用語。文學家不應該把英雄的粗俗和笨拙作為自己的所有物，正如他不應該為了自己的描畫而採用英雄的歪曲的語言一樣。他採用這種言語只有為了人的性格描寫，不用辯論，——我們是生長在那一切——和語言——都革新着，進步着的國度裏，却可笑地遇着這樣笨拙的聯字，例如：「激發了諧音」，「用套索把思想纏裹着」，「纏繞的面龐」，和諸如此類荒謬的字組合，沒有一點是「智慧的，誠懇的」話語。要寫得栩栩如生的的嘗試，把伊利亞克引到這樣的效果：「像椿一樣豎直着的手車把頭撞入天花板裏」，「人跑着，——」像風馳般迫逼他，在空中盪漾着他獨有的，死一般蒼白的腳」。作者想要做成「可怖的」，却做出了可笑的。因為人在夜間，在「暴風雨前的黑暗」裏跑了，——他未必能看到自己腳的顏色。那有伊利亞克這些空幻的片斷對於他的 소설是非常有害的。

我只在書上知道小說「天鵝」所描寫的騎士生活和境遇，——我當然不自認有權利談論這小說的內容，批評他的英雄們的互相關係。歐洲各種階層的生活，我也只在書上知道。然而懷遜，巴爾托克，左拉，莫泊桑，狄更斯，卡爾奇和歐洲其他文學家都絕少引起讀者的我懷疑他們描寫事件，性格，感情和思想的邏輯的正確。伊利亞克沒有常常對提供給我的事實引起信心的。例如，他的小說的一個

英雄，莎爾查，在一萬六千工人中間只找到三個「思索機器」的，即是努力學習，理解機器，使機器聽從人的意志的人。只有三個嗎？我覺得，在一萬六千個「屬於每個營場金屬運動的堅強的一環的特殊底，獨立底生命」中是很少的，——正如伊利源克所說的一樣，——對於勞動創造如此廣泛地發展着的國度是很少的。

作者用太單純的方法來描寫人們，因此描寫得不很動聽。他的小說的某些人物是引起迷惑的。例如舍爾仙維克仙。可是在這性格裏，沒有一點是可以相信的：在銀幕上卓別麟跌倒了；滑稽地跌倒並且通常滑稽地生活——是卓別麟的職業，這使他獲得全球的聲譽。卓別麟跌倒了，觀眾就哈哈大笑。雖然卓別麟的臉孔「泰然自若，沒有疼痛，沒有怒氣，沒有苦楚」——維克仙却是憤怒的，他「必要知道，如果有人跌傷在路上，為什麼人們哈哈大笑呢？」人沒有受傷，可是維克仙顯露着多情少女的奇異情感和憤怒，罵道：「暴徒們！為什麼笑呢？」我相信維克仙當看了和看到人跌倒的時候。他自己也常常笑過和要笑的，在這樣的場合很少是不笑的；跌倒的動作差不多常常是滑稽的，尤其是胖子跌倒。更進一步，在小說的一切範疇內，這種銳感性的維克仙沒有顯露出來，反而似乎是小說中多餘的人物。伊利源克把老工人的典型做成比年青的典型更為活潑，這大概是因為共產青年沒有在「天軸」裏扮演可注意的角色。我覺得，在這場合裏伊利源克容忍了和現實的某種矛盾，而且「天軸」的機械部分，如火車的部分一樣，過分地遮蔽了政治的軸心工作。雖然我不對是可能的，因為我不完全曉得小

說的事實是在那些年代裏展開的。顯然地——不是在我們今日，因為在工場上是沒有它們的：最後四年的社會主義競爭過程，仍有着許多有性格的突擊隊員。

青年工人莎爾查——是初次和現實鬥爭的一個意志薄弱和煩惱的人。年青的專家帕拉多夫和維克仙在講壇上辯論，絕不像革命家所應辯論的一樣。帕拉多夫想要說最有價值的，這是：「研究情性理論——在政治上是有害的。」這是書中很適合的話，在那本書裏懶惰的人們是被指出來了。這一切，不待說，只是我的感想——老讀者的感想。

伊利源克——是現實主義者而且是很嚴肅的。他喜愛和能夠強調着我們現實的某種委細。例如，「二十歲的胖子坐在軌道上，把乾豬糞送入口裏去」。我不知道，這寫實畫對於我們今日是有多少分的特性。「人望望天空，解開了褲子」——伊利源克描摹了「剛復的」莎魯娃。肺癆的那裏是很軟弱地把年來工作所積儲的殘留聲機和一切「慰藉」放棄的。他的派系的人們是不這樣容易捨棄舒適的，像伊利源克所說的一樣。

關於伊利源克的小說的意向，我不說了，只是重複一句，作者——無疑地是能幹的人。然而他完全需要更熱誠地，沉思地關心自己的工作，不要用「辭藻」來誇大了，不要誤用語言了。在我看來，伊利源克的小說是被綏拉菲莫維支領銜的一羣文學家過分地贊揚了，而惶恐的是，這過分的贊揚却沒有把裨益帶給「天軸」的作者。這言辭的軸是用好材料製造的，可是——不能夠好的，因為他把材料

束縛着了。

這裏要適當地注意我們常有的惡現象：一個青年寫成一本書，他的親愛同志們馬虎地讀了這本書，就熱心地大肆贊揚，喊道：啊，多麼能幹！受了激勸的贊揚，作者就自鳴得意，走在泰山上，自認爲「一切能做的，他都已完成了」，什麼都不學習，却渴望着更進一步的狂熱贊揚。然而把他褒揚了三個星期，而後一下把他從高處推倒，那高處是他們忽然把他舉高到的。他平常不想一想因爲什麼褒揚他，並且不明白因爲什麼又推倒他。這使他昏迷，憂傷到發狂，他寫了封絕望信給某人，在信裏他的小自尊心顯出他的社會學和文學的無知，也顯出他的無能來理解在我國，在我們環境裏的文學工作的最深長的意義。他們常常在狹窄利益的思量上把作者褒揚和推倒，差不多和前進的革命文化的文學政策沒有一點相同。這是很壞的，又因爲都是壞的，所以完全是不必要的。被不公平地褒揚而後又被推倒的作家們，在我們那裏已經堆積不少了，而他們當中有許多是用傷害自尊心的叫喊和嘲笑聲來「毒害風氣」的。

跟安得列布拉爾辯論，格漢涅駁道：「如果你不能寫得好——就敢就不寫吧」。這，不待說，是說得過分嚴肅的，對那不明白的人講，也許他們完全不懂普羅文學的革命思想和文化目標的。蘇維埃，是需要普羅文學家的，不然就喊道：同志們，你們必須學習並且要學成優美地著書，這——是你們在你們的階級前面的責任啊！蘇聯的一天給蘇聯文學家說——從蘇聯的報紙，從工人突擊隊員的書信

，從藝術家的工作，從新世界建設者底無數目親的，實在的事實裏看出來，——蘇聯的一天高聲地向全世界歌唱着你們階級底巨大英勇，天才的工作，歌唱英雄——人，階級底集體英雄主義產生的人。這偉大的工作，這偉大英雄還沒有反映在文學裏，沒有在那裏面得到應得的畫像。如果由他所獲得的目光來描畫時代英雄，現實主義方法是妨礙你的，——尋找其他的方法吧，製作牠們吧。事實——仍不全是真理，牠——只是粗料，從牠那裏應該調和，抽取藝術的純正的真理。鵝和羽毛是不能在一塊兒烤熟的，而在事實面前的信服正使在我們那裏偶然的非必要的和主要的典型的混亂着了。必須學習選擇事實的無形精華，必須能夠從事實中抽取思想。不笨的工人安得新金看見孩子「把猪糞向口裏送」；從前是自然而然的，如果回到家去，工人他對自己的懶惰妻子說：「蠢婦，做事啊！」

我們的生活速度沒有匆促地把工作糾正過來，倘若做得更快些的話。簡易化的說教只能引導文學工作，向無靈魂的自然主義去，向那全能工作的死畫像去，那工作使勞苦大眾的世界再生，使牠從百年來奴隸制度的生活和思想中解放出來。簡單化的說教能使一切習俗變為單純，能使工作的疏忽的可靠的習慣，曲解的無價值的材料變為合理化。

普羅列塔利亞的世界觀仍受着敵對主義的侵入。例如，我們可能有過「縮減文化機關」的必要說教。這種理論的反響仍沒有落在建設的聲浪裏，而文學簡單化的傾向——是反對普羅，反對文化的邪說的一種反響。在簡明和單純之間是有主要的區別的，牠可以這樣解釋：簡明，這是人工製作的，邪

是虛偽的，而單純——是原本的藝術。未來的真理——就是單純和清晰。普通文學家必須力求單純，清晰，明朗。他是為明日而工作的，而他的書很快就被共產青年團開始閱讀了，十月兒童（註一）——是明白的主人。應該記着，文學家在那正要代替他的後代面前是有責任的。明日以前的責任感，在我們這裏是發展得貧弱的，而這就是說明：很多壞的已經是消滅的時候了。

一九三二年

註一 未達到學齡的兒童稱為「十月兒童」——譯者。

論 語 言

大家都知道，人類藉以區別於禽獸的一切才能在勞動過程中發展了，而且繼續發展着的。明晰的言語的才能也在這田地上產生出來。上古的人類言語無疑地是極端貧乏的，字的性質——是不重要的。創造出來的和活用的，只有適合現代的動詞形式的單字：砍，負荷，提起等等；量度的單字：沉重，短，窄，遠長，冷熱，痛苦和諸如此類。雖然勞動工具的名稱是在晚近才有的，那時候人已經可能想到命令某人了：給吧，帶來吧，放下吧，弄斷吧……

言語直接由於勞動方法的擴大，而被新的字彙豐富了。這些新字彙是被日益不同的勞動目的和勞動方法的日益複雜所喚起的。很顯然，這言語完全不容納無意義的字彙的。

十世紀來最沉重的勞動，使得勞動大眾的體力創造了理智——智能——的成長的條件。人類的理智是在改造有組織的粗物質的工作裏產生出來，而且它本身不外是被能力精細地組織了，更精細地組織着，從這能力裏用和智力一塊並支配它的工作方法，用探索和精通它的力量和性質的方法抽取出來的。社會的階級組織使得勞動大眾的智力利用和自由發展的權利，連同其他的權利一齊被剝奪着。這使得文化發展走向不合理的人造的停滯，使得文化集中在少數人的習慣裏，終於使得我們今日顯露

出這文化的表面，脆弱，——顯露出榨取者放棄智識價值的意向，而且彷彿要抹殺大眾的許多世紀的勞動——「精神文化」的基礎似的，布爾喬亞不久以前還把這「精神文化」誇耀為自己所有的財產，自己的業績呢。

在從古代發展到今日的最深奧的社會事件裏，是不應該有喪失意義的字彙的地位的——不管這些字彙是包含真理或是包含謊言。謊言和真理是從一個源流裏發展出來的，它的基本根源就是少數人榨取大多數人和勞動者反抗榨取者的鬥爭。神學家，牧師和哲人之流常常是謊言最熟練和最狡猾的創造者。他們在當時全權的教會所指定的道路上走，同時在反對真社會的真理的一切萌芽的鬥爭中，使用着基督教崩潰的理智的衰頹力。

神學家製造許多虛偽的單字：上帝，罪惡，邪淫，冥府，天堂，地獄，順從，柔和等等。這些字的虛偽意義是顯露出來的，雖然有些字的外殼，例如「冥府」，仍保留着，但被其他已經不是神祕的，而是社會的思想所充塞着了。這些有效地遺留下來的教堂的卑小的字彙就是：虛偽，欺騙，愚鈍，盤剝重利和其他許多卑小的字，遺憾的是，都被事實的存在證實了。所以我的一個通訊員堅信着「一定要消滅語言中斯拉凡教會的字彙」，同時却針射着目標以外：即首先必要廓清生活中的可恥的事實，而後闡明這些事實的字彙才能從語言中自己消滅了去。在古斯拉凡語言中仍有些有重量的，善良的和寓意的字彙，但必須區別那是教會的教理或神學語言或詩的說教語言。阿哇固主教的信札和他的一傳

「記」的語言和風格，保留着戰士的熱情，動人的辭令的無匹的形象。一般地說來，可以在我們的舊文學裏學習點什麼的。

在基于勞動過程，基於嘗試使日益複雜的社會關係清楚或曖昧的語言裏，寄生的和喪失意思的字彙從什麼地方和怎樣表現着呢？有一個很簡單的回答：一切寄生狀態都是寄生蟲產生的。但這樣回答——是太簡單了，所以是有害的。

記不清少年時有一次在什麼地方，我讀了用來命名住宅內部裝飾的樣式的字——「羅谷谷」的這樣的解釋：一羣法國貴族受了某城的布爾喬亞的邀請參加一個節日，他們被市政廳——市會——裝飾的巧妙和華麗所驚愕了；在這些裝飾當中，有一隻花茶的法國西羅雞特別耀人眼目。其中一個貴族，也許是個口吃的或者簡直是個啞巴，嘆道：「羅羅羅」（Lolo）），他的同伴却讚道：「谷谷谷」（Gogogo）。這是很夠了，「城市父老」因此採用這無意思的字作為裝飾樣式的名稱。因為這是笨的，所以可以想到：這是真的。

然而已經完全無可爭辯地，謬妄的語言的滓渣就是階級仇恨的反映，譬如這仇恨就常常採取藐視，無視，嘲笑，譏刺諷的形式。當布爾喬亞開始講自己「時髦的」——哲學家，文學家的語言，而且它比那受僧侶教育的貴族更有學識，更有「自由思想」的時候，英國，法國的封建貴族戲弄和戲弄布爾喬亞的言語。而布爾喬亞自己呢，却愚弄技工，農民的語言並把它視為謬妄，正如我們的農民嘲

笑、歪曲、愚弄地主、莊國主和一般市民的字彙一樣。

不用說，寄生的和墮落的字彙造成的語言滓渣，不獨是根據這條路線走，——怠惰者還把許多毒害帶到這行程中來。在伏爾加河一帶的城市裏，惡俗虛構的語言滓渣成爲商店主人一種愛好的娛樂。冬天，生活是枯燥的，生意不興隆，訂貨的顧客很稀少，主人厭倦了下棋，厭倦了喝茶，聊天。然而籌才仍沒有失掉。下城裏一個商人阿列別葉夫——「麻，木，席料的貿易商」——娛樂他苦寂的鄰居，把棋子裏的女王「小蝴蝶」叫做「舞女」，把廁所叫做「維脫里·戈舍」即 *partrycloset*。或者弄兩行古歌謠：

農婦洗擦門廊，

丟掉了刷子——

並且增補特別的見解：

魔鬼找到刷子——

跑到澡堂去洗浴，

一個少婦正在澡房裏

洗她一磅重的乳房——

再下去——是難以描寫的。然而看到這個有着孩子般的小頭，太監般的黃色小腫臉，小貓般的稀薄小

搖，正和梭魚一樣的綠眼睛和小齒的大胖子狂烈地用沉重的雙腳打着拍子，用手扯緊狐皮衣，濃重地打着野歌唱着的時候，是可怕的。他這樣歌道：

汽船——凍住了，

譏兒，譏兒，卡兒，卡兒，

破着伏爾加河的水前進，

丁丁，嗒嗒，

帶着咕嚕，哈爾，嘶啾的聲音，

帶着各種腐壞的屍體，

碰打着鱸魚，鱒魚，

ah cho che enu.....

雖然亞列別葉夫背後的商人階級譏笑他，——「丑角」，可是對於他很誠懇的「有創造力」的著作，感到它裏面是有某種思想的，並且相當害怕他這種狂暴的語言遊戲。「百姓——是賢明的，懂得我們所不懂的」，一個網繩商人巴爾威·莫羅索夫這樣說，他曾沉湎於「單調的生活」，將單字顛倒，掉換字的重音：「H xochy」（我不要）他說成「HeChyxо」；「caxap」（糖）叫成「xapea」；「kacch」（一種麵包）叫成「Euchka」等等。然而當他的神父的執事，一個著名大食客，把「

hek] (佳節) 叫成「rpahek」的時候，莫羅索夫就賞他一巴掌，說道：「別學主人玩弄話頭吧，蠢才！」

商人階級和小市民層根據自己的淺學很費力地和簡單地想出新的字彙。當斯千博克·費爾米爾承接約克美列哇的烏拉人工場的時候，那些場主都不能正確地說出這個姓名，而發出這個音：斯道博克·莫爾郭夫。寄生蟲們豐富地提供了商人和小市民的口頭禪。我們在齊非列講適合於喬治利亞人的語言的語言，在下桑講穢穢人的，在浦監斯德講中國人的等等事實，對於語言的毀損曾經起了並且繼續起着巨大作用。這種純粹機械的模仿，無論誰模仿誰都同樣有害的，它老早就成爲一種「傳統」之類了，而有些傳統不外是毀壞所熟悉的工作的腦殼。我們有「本國的語言」，並且維護「民法」的浮藻聲音還聽得不久，然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猶太民族主義者已是第一個開始主張講「Tyson」，「Chyon」了。（這兩個字在革命後已不用——譯註）

在新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創造的許多偉大任務中，組織語言，廓清語言的寄生滓渣的任務在我們面前提出來了。正針對這個，我們蘇維埃文學最主要任務之一被提出來了。革命前的文學的無可辯論的價值，從普式庚開始，乃在於我們古典作家從言辭的混亂中摘取最準確的，鮮明的，有重量的字彙，並創造了那「偉大的美麗語言」，屠格涅夫懇求列奧·托爾斯泰從事更遠大的發展的語言。不要忘記，我國是多種語言的國家，比歐洲任何一國的都要多過，不要忘記，在語言上是多種的，她必須在

意識形態上是一個。

這裏我不得不再講幾句話關於潘菲洛夫——一個雜誌主筆並教導青年作家，而本人顯然沒有才能或不渴望學習的人。在「我們的一代」文集的序言裏，他寫到關於「如奴隸般服從過去的古典的沮喪的人們」，關於「因為兩句失敗的句子就準備把煙火放到任何一本近代的書上去」的人們。他確信「在中央會議的議決以後，作家好像鱸魚一樣走路」，「年青的一代用着堅實步伐走進文學裏，把我們兒童的血肉帶進文學裏」。『年青的一代把我們兒童的血肉帶進文學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過去的古典』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潘菲洛夫在「我們的一代」文集的序言裏確信「馬克思主義——是鱈魚」？我確信，說出這些話的人，也不會理解他自己所講的是什麼意思。「鱈魚」——是很小的魚，味道也不好；許多青年跑向文學去，像去做「季節工作」一樣，並且把文學看得「好像看容易的工作一樣」。這種文學的傾向簡直是對青年提倡潘菲洛夫之流的導師和「生活教師」。無根據地過獎青年作家，把他們的文集出版得太早，教師們是把毒害帶給文學，帶給作家的。在我們的國度裏，每個戰士必須是個很好的職字的人，而那些以庸才創造自己的軍隊的「領袖們」，不能做領袖的。

廓清書中「失敗的字句」的鬥爭正和反對言語謬妄的鬥爭同樣地必要。不得不很悲嘆地指出：在這樣順利地——一般地——達到高度文化的國家裏，語言辭句却充滿着這些笨拙的語句和會話，例如：「麵包屑」，「麥酒」，「風笛」，「充飽」，「給五個吧」，「Kasha」（俄文舊字母革命後取消

的——譯註）等等（以上幾句譯成中文，則看不到它們的笨拙，但在俄文，似另有較好的同義字——譯註）。

麵包屑——這是在小白麥搗碎或經摩擦器磨碎，混勻着葱，倒入麻油和稀薄的酵母而成的硬麵包；麥酒——是醉人的飲料；風笛——是樂器，可以奏快板的；*Авось*，誰都曉得，——是字母，從字母表裏被取消的舊字母。爲什麼需要這些字彙和話語呢？

必須記着，含有概念的字彙，是被長年的勞動經驗所組成的；必須記着，要批判地檢討字的含義。爭取清純，爭取思想的準確，爭取語言的銳敏，就是爭取文化的武器。這武器越銳利，這方向越正確，——它就越勝利。正因此才有些人永遠致力於使語言拙笨，另一些人却致力於磨利它。

把文學——給與兒童

從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消息報登載一篇論文「把文學——給與兒童！」這論文的作者馬爾沙克，兒童文學部門一個有能幹，有經驗的工作者，完全正確地提出了需要性，戰鬥口號性的論文主題。

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顯明地誰都難以容忍的：在國家裏，致力於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勞動階級，國家主人和執政，父母底前衛——共產黨人，加強發揮了和更發揮着巨大，空前的能力——在國家裏，社會主義兒童教育事業仍和第一個計劃離得很遠，好像對這事業的主要的，決定的意義很明白似的，我們已缺乏注意時間和創造力了。

我們教授七八歲兒童識字，但沒有什麼給他們讀。每年出現着十萬新讀者羣，却沒有他們的讀物。在任何集體農場裏，在任何小村莊裏，那裏僅設有兒童樂園和育嬰室，對兒童讀物的要求便發生了。甘扎加、遠東、北部地方都需要初級學校書籍。但，甚至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兒童也沒有爲着發展他們的本質上必要的全套讀物，我們對於遙遠邊陲回答什麼呢？

「沒有書」。這句話不獨講到在這十五年內已爲低年兒童寫成二十本成功的小冊子，出版了很微小的冊數，——這句話而且也講到在我們這裏沒有爲兒童創作，寫成那些書，那些書必須推進兒童

對智識的興味，必須使兒童易於理解學校的科學，使他們熟知父親所瓦解的舊現實，熟知父親爲兒童而創造的新現實。問題是在於迫切需要爲兒童創造新穎的，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的通俗科學和淺顯文藝讀物。兒童必須比他們父母，新世界創造者，更爲有教養，而且更爲活動些。不怕大言，我們必須說，我們的兒童仍須培養成爲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更活動的領袖，爲了這，我們就須從他們幼年起把一切智識力量，把反抗舊時代的保守主義，社會環境的死氣沉沉的，卑鄙的影響底必要力量來武裝他們。

布爾喬亞的，革命前的兒童文學，和它的本質沒有關係地，把一些宇宙概念給與兒童。這在小說和圖書裏給與低年兒童；在原作和翻譯的故事和短篇小說裏——給與大的兒童。在兒童文庫中，藝術文學佔了多數。但也曾有許多通俗科學的文學——數十本關於物理，天文學，動物學的書，百本關於歷史的書。

我們的事業是困難的，因爲我們在這布爾喬亞的遺產中可得到的只是很少，尤其比得到成人文學的更少：有些古典作品和世界民間敘事詩，——却是在新譯本，編譯本裏——有些是採取成年的通俗科學的文學，（齊美列思夫的「植物生命」，法那狄的「服燭的歷史」等）

首先，關於我們科學和技術進步的書，不僅要把這類的思想和經驗底自然成果提供出來，並且要指出困難的逐漸克服和正確方法的探求，以便將讀者誘導到研究工作的過程中去。

必須寫成（不只一本）若干本關於已經給了人們的，能夠給我們的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環境裏的
物理學和化學。

較狹窄的，具體的主題的書，也是可能的，需要的。

這些主題常常開闢一條機智的，新穎的道路來提取真確材料。例如，一個青年學者所提出的書「
論蛙在科學中的作用」就是這樣構成的。這是其中的幾個例子：

這書關於私有財產從何處產生，它成爲現代人類的發展的路上的何種障礙物，它怎樣封塞科學思
想的自由發展。

工匠，英雄和神。

關於人民的真正領袖的形像，勞動英雄，怎樣成爲牧師的抽象的神。關於僧侶和牧師的書。

什麼是蛋白呢？

什麼是哲學呢？這書必須用諸語提供出思想方法的基本觀念，敘述關於怎樣創造概念。

地中心旅行，附有活動的地球儀的地質學書。

地文學書，附帶着適當的，可拆的模型。

物質對立，借助於簡淺的圖案，使兒童熟習物質對立。

技術上的真空的意義（「爲什麼——沒有什麼？」）

度量 and 質量。關於面積，重量和時間的準確度量對於人們有怎樣的價值的書。欠確的結果——就是火車的擁擠，機器部分代替的不可能，人們受毒的死亡，包括藥物等等。（這主題是部分地在青年女作家美亞列耶夫的書——「準確的工廠」裏被提到。）

關於人的構造的書（象腦殼，咽喉，腹，等等虛脫的模型。）

人怎樣變成巨大的？關於科學和技術怎樣伸長我們的視覺（望遠鏡，顯微鏡），聽覺（電話，無線電），足部（近代的移動方法），手部（遠距離的駕駛）等等的書。

文化史必須佔兒童讀物部門中大篇頁。我們沒有看見有貫串的，系統的課程。這必須是有關於各種勞工史，物件的歷史（車，船，織機等）的各種題材的叢書和見聞錄。

同時，必須將近代科學世界觀的梗概給與兒童，好像奧列莎的書「人在宇宙的地位」之類一樣。

我們必須得到最優秀的作家和藝術家給與我們有關世界各國的書籍和見聞錄。關於蘇聯諸民族，那些被派遣到全聯邦領域上的無數遠征隊隊員和地誌專家能比任何人都說得完善。他們會將變遷，發展過程中的民族生活指示給我們。這類書是非常重要的時代文獻。

不必以為，所有兒童讀物都要無例外地給與認識的材料。我們的書必須不是說教的，不是故意嚴肅的，牠必須用形象語言來講，必須是藝術的。我們需要愉快的，有趣的書來發展兒童的幽默感，必須創造新的幽默個性，這些人個性要成為全部兒童叢書的英雄。

初級學校需要顯淺的，而同時用高度藝術技巧砌成的詩歌，這些詩歌爲了遊戲，節拍，諧謔而提供材料的。同樣地，兒童讀物的現代技師需要出版若干本編輯自民間傳說最好手本的集子。

兒童文學的一切需要都是不勝枚舉的。

這是不驚異的。

俄國革命以前的文學有過一百五十年左右。蘇維埃的兒童讀物正年輕十倍——牠總共十五年。在使兒童發生興趣的無數問題上，在使兒童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它仍沒有堆積了可以充分選擇的書籍。

然而我們必須採用更堅決的方法，以便於最短期間把文學（爲着兒童的文化成長所必要的）給與我們的兒童。

這樣是可能達到從世界和蘇維埃文學，包括兒童文學裏，熟練的，謹慎的選擇較有價值的書籍底道路，也達到作家，學者和藝術家廣大幹部的蒐集和類引的道路。

（一）這樣的事業大概只有和兒童文學有關的專門出版部——兒童出版部才能盡力。

（二）這出版部必須由對事業確能勝任，專心的人們充任，同時也要有充足的物質基礎。

（三）必須建立工廠，出產適合於兒童藝術書的特種紙張和卡通，以應出版部的需要；同時也在出版部附設良好設備的印刷室和繪畫用具的技術室。

是廣泛地，熱誠地提出關於兒童文學的問題的時候了，正如在我國機關所提出的一樣，一切大問

20
題都要求着急迫的解決。

關於故事（註一）

你們問我，民衆故事，歌曲給了我什麼嗎？勞動人民的象形文字，古詩和散文，——他們的文學，這文學在發明文字以前開始由於「口口相傳」而被稱爲「口頭的」，——這種文學，我早從六七歲就熟識了的。使我熟悉這種文學的，是兩個老婦人：我的祖母和保姆葉佛根尼亞。保姆是個小而矮胖的老婦，有着一個大頭，好像兩把互相偎靠着的白菜頭一樣。葉佛根尼亞的頭髮濃密得不自然，頭髮是不少於兩匹馬尾巴，它們是堅韌，灰色和卷起的。葉佛根尼亞用兩條黑黃色的圍巾將髮包紮着，而頭髮仍然從圍巾下面突露出來。她的臉孔赤紅，細小，扁短向上，沒有眉毛，好像新生嬰兒的臉龐一樣。在這短胖的臉孔上，裝上一雙愉快的藍眼睛，好像浮游着一樣。

祖母也有濃密的頭髮，可是她用「頭飾巾」（類似帽冠的小絲帽）來緊紮着頭髮。保姆在祖父家裏至少也住上二十五年了，她會「撫養」祖母無數的孩子，會埋葬他們，會和主人一塊兒哭泣。她也教育了第二代——祖母的孫兒。我記得這對老婦不像主僕，却像朋友。她們一塊兒取笑祖父，當他向她們任何一個生氣時，就一塊兒啜泣，一塊兒醜態地碰着酒杯，兩杯，三杯。祖母叫保羅葉佛根，保羅叫維河姑萊。吵鬧時，就嚷道：

——唉，你阿姑萊卡，黑女巫！

——你呢——灰醜婆，毛蠢貨，——藍母回答道。她們常常吵鬧，但在短時間，一點鐘，就和好如初，驚訝道：

——噢什麼呀？沒有什麼會離開我們的，只是叫嚷。唉，蠢婦人……如果祖父聽見老婦們傳佈，他就斷定說：

——對啦：真是蠢婦。

在一個冬天的晚上，暴風雪在街上吹噓着，打擊着窗扉的玻璃或是烈霜爆裂響着。那時候祖母坐在靠着廚房的小房間裏編織花邊，斐佛根尼亞也蹲坐在角隅牆簷下面捻線。我爬上保姆後面的衣箱，傾聽這對老婦談天，觀看着保姆的後頸像鈍擺子一樣擺動搖搖欲斷。老婦們單調地敲着紡車，紡錘聲營作響，她們談到鄰舍在夜裏又分娩了——第六個了，父親却仍是「沒有地位」，他的大女兒滑旱地來乞求麵包。她們談了許多關於食品：午餐時祖父咆哮了——因為菜湯不夠油膩，犛肉煮得過火。在某人的命名日，人們弄壞了奧斯賓斯基神父的六絃琴。我知道這神父，他曾在我祖父家作過客，演奏叔父耶果華的六絃琴。他——是個巨大的，有鬚的，紅鬍子的人，有着一個大獸口，口裏有許多白牙齒。這——是真正的神父，正是保羅葉佛根尼亞所敘說的那個。她是這樣說道：上帝想做一隻獅子，軀體成形了，後脚按上了，頭配合了，鬚黏貼了，牙齒裝置在獸口了——完成啦！瞧，——只沒有材料

做前脚。把魔鬼喚來，並對他說：「我想做隻獅子——却沒做出來。我下次做吧。這隻不適合的，你笨傢伙拿去吧。」魔鬼高興地說：「給來吧，給來吧，我用這糞來做神父吧。」魔鬼就將這隻不適合的獅子黏上了長的手，——神父被做出來了。

在祖父家裏，從早到晚響嚷着「神」這個字：求神保佑啦，請神作證啦，用神來威嚇——神要責罰的！但除了口頭的外，我不覺得在家裏有任何其他關心神的，但祖父把家裏所有的人都責罵了。

從保羅的故事裏，神差不多常常是愚笨的。他住在地上，行走在鄉間，在各種人事裏擾亂，而一切都失敗了。有一次，風把神阻滯在途中，神就蹲在樺樹底下休息，——一個農民騎馬走過。神感到寂寞，就留着農民，問道：你是誰呀，從那兒來，向那兒去呀？問問這，問問那，不覺天已垂黑，神和農夫就決定在樺樹底下過夜。清晨醒來，他們一睡，——農夫的牝馬產下一匹小馬。農夫高興了，可是神說道：「不，等一等，還是我的樺樹產下來的。」他們爭論起來。農民不肯讓步，神——也不讓步。「那麼見法官去吧」，——農夫說。到了法官那兒，農夫請求道：「判明這件事吧，講真理吧。」法官回答道：「尋找真理——需要錢啊，給錢——就說出真理！」農夫是貧窮的，而神呢——是貪婪的，愛惜錢的，他對農夫說：「他解決不了什麼的。我們到天使長格菲列那兒去吧。」他們好奇易才走到天使長那裏。格菲列聽了他們的話，想了一會，附着神的耳朵說道：「先生們，這樁事是簡單的，容易解決的。可是我有一個這樣的課題：我在海洋上種麥，它却不生長！」——「你真蠢，」

「神說道，——難道麥在水裏生長？」這裏菲列就逼迫他：「樺樹也能生小馬嗎？」

有時候，神是惡毒的。這樣有一次，他和聖猶列夜裏在鄉間行走。所有茅舍的燈火都熄滅了，只有一間茅舍還燃着火，小窗子是打開的，但掛着窗簾。在茅舍裏彷彿有誰在呻吟着。可神是要知道一切的。「我要去瞧瞧裏面做什麼」，——他說。猶列却勸止道：「別去已，不好膽的，婦人分娩呢。」神不聽，拿起窗簾，把頭伸進去。接生婆就用牛奶瓶敲在他的額上——一下！牛奶瓶也打碎在腦殼裏。「好噫——神說道，擦擦額頭，——在那裏出生的人將必在世上沒有幸福。我誓必使他這村」。過了許多時候，三十年，神和猶列再行走在那村莊附近的田塢上。猶列指着那塊田地，那裏的稻米都比其他田地的長得濃密些，高些。「瞧噫，神啊，這塊地給農夫長得多麼好啊！」神也稱贊道：「這就因為農夫虔誠向我禱告！」猶列說：「就是那個農夫呀，你記得嗎？他出生時，她們用牛奶瓶敲打你的頭額呢。」——「這個我沒有忘掉」，——神說完了，就命令魔鬼毀壞農夫的田地。稻米被摧毀了，農夫哭起來。猶列却勸他道：「別再種稻了，養牲畜吧」。五年又過去了，神和猶列重又走在那村莊的田野上。神看見了一羣很好的牲畜在散步。他又稱贊道：「如果農夫尊敬我，那我就施恩給他。」猶列却禁止不住，又說道：「可是這些牲畜就是那個農夫的……」神於是把「黑死病」遣派到這羣牲畜裏，把農夫的牲畜都消滅了。猶列對這受損害的人勸告道：「養蜂吧」。一年又過去了。神走着，看見豐盛的蜂房，贊道：「喂，猶列呀，我有這蜂房是怎樣的幸福啊」。猶列沉默了。叫農夫

跑近來，翻壁對他說：「請神做客吧，用密飼奉他，他會不替你的。」農夫就招呼他們，飼奉以甜糲，麥片，密水。神喝着密水，贊道：「農夫愛我，他尊敬我！」猶列於第三次提陞他關於額頭上那塊疤痕。神停止喫喝，看着農夫，想一想就說道：「好吧，讓他活下去，我不再動他！」農夫却說道：「謝謝上帝，我快要死了，我已經白費了我所有的力量」。

祖母聽了這樣的故事，大笑起來，有一次哈哈大笑得眼淚也都流出來，嚷道：

——噢，葉妮，費話噫！難道神是這樣的嗎？他是善良的呀，貨！——保姆大聲反駁道：

——這是故事，不是實事呀。這樣的上帝也是有的，從祖父華西列亞那裏就找到他啦……

他們開始爭辯着，這也使我感到厭煩，爭辯誰是真正的神，是沒有趣味的，也使我不懂。我要次祖母和保姆唱歌，但她們輪流向我生氣地嚷道：

——別管我們啦！走開吧！

我八歲已經知道三個神：祖父的神——是個嚴厲的。他要我對長者聽話，服從，謙遜，而這一切在我是發展得薄弱的。祖父依照自己的神的意思，虔誠地把這些品質注入我的皮膚裏去；祖母的神是善良的，然而有點柔弱，無用；保姆的故事的神，是愚笨和無恆心快活的好人，它也沒有引起同情，但却是最有趣的。十五——二十年以後，從羅曼涅夫的「白俄羅斯故事」集裏讀了一些保姆所講到神的故事，我感到很大的喜悅。根據保姆的故事看來，宇宙的一切都是愚笨，可笑，欺騙，拙劣的；洪

官——是販子，出賣真理，好像出賣贖肉一樣；貴族地主——是殘酷的人們，但也是不智的；商人會貪婪到這地步，在一個故事裏，有個商人差五十戈貝才够得到一千盧布，於是爲了五十戈貝把妻子兒女出賣給鞑靼人。鞑靼人把五十戈貝給他握在手裏，但把他和一千盧布同妻子兒女一起，伊涅克琳姆他自己家裏。我覺得，保姆的故事和祖母的歌曲那時候已然提示我一種模糊的信心，就是有人很清楚地看見一切愚蠢，惡毒，可笑的，這人是不信神，魔鬼，沙皇，祭司的，這人是很聰明和勇敢的。

我大概早在八歲時就感到有這樣的力量，這使我感到在小說，歌曲和那包圍着，窒息着，逼迫着，到處阻擋我的殘酷生活之間的一種峻嚴的區別。這種力量當然不是保姆葉佛根尼亞的，家裏人人都叫她「傻瓜」，甚至她的忠實女友祖母常常對她說：

——噢，你好蠢呀，葉妮！

這種力量是在故事和歌曲裏被感覺到的，祖母知道無數這些故事和歌曲。當她歌唱時，祖父總不愛聽。

——喂，又吠啦！——他生氣地大嚷道，——葉妮，你一個瞽洞都不知道，你的歌却像頭髮一樣！把頭髮修剪一下吧！……

但當他外出或在工廠上工時，祖母在院子裏不輟地敲着紡車，吩咐保姆道：

——喂，葉妮，連唱啦。

於是保姆用着和吹笛似人的音調一樣的喉聲，歌唱道：

「噢，咱們的打毛人集合了……」

祖母把聲喉提高些，緊接着：

「在荒涼的，遙遠的工場……」

幾乎一切歌曲和保姆，祖母與家裏各人談天的日常題材矛盾得很尖銳。這些談天是關於番薯在地板底下發芽，必須挖開它，用灰燼散播它，關於某人給祖父「安放了」一條絲圍巾和銀獎匙，關於單眼睛的鐘錶匠耶哥佛拉向我母親求婚，而她不願意嫁他，雖則這單眼睛的鐘匠有三千金儲存在銀行裏，——總之是談到關於飽暖的人和富人的行爲。她們却唱着關於勞動，飢餓，不快活的歌曲。我直到今日還清晰地記得，這兩個老婦人低低地，不可忍受的憂鬱地唱出關於拖船夫訴苦的聲音：

「哎喲，哎喲喲，

上流風吹曉得多利害啊！

咱們餓着肚子赤着脚走，

雙脚被石頭碰壞。

幫忙啊，尼古拉，

幫我們拖到夜啊，尼古拉，

哎，拉！是哎喲，噠！

踏實你的脚步啊，朋友，

把皮帶拖緊啊！

哎唉，哎喲喲……」

這哀號實在使我煩惱，我打斷了並請不要唱這無盡頭的歌。保姆對我生氣了，急切地說道：——小蠢人，——你怕什麼呢？又不是唱關於狼的歌。

那麼，唱隻快活些的歌吧，——祖母提議道。「快活些的」歌也沒有使我快樂。

「烏斯丘莎生了孩子——她沒想到，

七個出生了——她憂鬱起來。

「哎，可是給什麼他們喫，喝，

哎，可是怎樣教他們聰明？」

歌的詞序變得彷彿是快活的，可是唱下去，歌就成爲更沈悶，憂鬱。不待說，我已忘掉這整個歌兒，在記憶裏只剩留着片斷，散行。從十五歲起我開始寫下那些我最喜歡的歌曲，然而在我的流浪生活裏，手抄本很容易就遺失了，而兩本寫了許多卜桑和威斯基和其他的歌曲的手冊，在我受禁囚時被下城的憲兵拿了去，沒有還給我。特別是這兩個老婦人常歌唱着快活的強盜的歌兒，我不是幾個記

得大騾跑得很快，不。它曾在能操弄動聽其他的更堅韌。因為祖母歌唱它時，有連地用隨打着拍。

孩子，做極地用紡車格格聲做第一拍。
一孩子，咱們要到那裏去？

那兒才顯出咱們的胆力？

盤據在城市的市長，

農夫不是市長，

穿不了金線長袍。

難難入在原野徘徊，

尋找劫掠的對手，

和健壯人相比——我們人數少，

被他們痛打一頓，

誰跑不——誰就被俘掠走。

在鄉村裏，住着咱們窮光蛋，

被紳士和地主拖去頑捉戲。

對大貴族——要舉手致敬，

對農民——却要打罵！

唉，孩子，這不幸才是慘痛！

讓咱們到黑叢林去，

在廣漠的大道橫行，

拿鉄錘跟商人開玩笑！

咱們玩——波戲。

頭戴僧人帽，

身藏寺院裏。

賊頭目做了僧長，

做齋撒的就是大尉，

還有尼姑愛我們僧人！」

我愛強盜，祖父敘述得他們這樣好，這樣值得稱贊，我就感覺着：可惜他不做强盜，却一生做了
染色工人。好的時候我甚至問他：「可惜嗎？」

——強盜要處死刑，坐監牢的，——他回答道。這却沒有說服我：人們因我強硬也使我坐牢，但
我却仍然更加強了，——生活底沉重的神氣使的沉悶逼迫我這樣做的。故事和歌曲的奇蹟不是每天

都有，也不很常有的。然而我們每天在家裏，在充滿着狡猾的和卑鄙的「不潔之力」的家裏，創造了其他的奇蹟。

在廚房的炊爐下面住着一個「主人」，「鬼」，祖母說道——這個小的，有毛的，綠眼睛的動物，很像貓，像貓，但有兩條腿。白天他安靜地坐着，夜間却在各房間曬着，跳着，跑上頂樓，在樓板底下追逐耗子，而且總是用零基物件玩着：在炊爐底下他很緊的搗着火棒，不能一下將它拔開，他把刀叉拋在地板上，他把茶具打碎——水壺，茶托，碟子都顯着裂縫，身子充滿了嘈雜，吶喊，噓跳聲。而且總是細微地而不緩地煩厭地作着惡劇。

我相信過鬼怪的。夜裏醒來，傾聽着他作業的低低的，賊似的聲浪，我等待着牠撲上我的軀體，開始使我發癢或嚙我的鼻子，刺我的耳朵。我會很厭煩地等待着這些動作，有時候我甚至藏匿在一斤重量的枕頭底下，爲着要規避「主人」。但有一次在清晨喝茶時，有些東西掉在樓頂上，然後分撒出一而再的碰擊聲。有人喊道：

——噢，這是什麼啦？

祖父蹙着額，劃着十字，拿着英尺走上樓頂去，技師格列哥里緊隨着他，其餘各人恐懼地，默默走着。祖父很快就回來，氣憤地說道：

——鬼怪惡作劇呢，有塊瓦片從烟筒裏墜開了，這是它——不吉的光頭呀。

我把瓦片檢起，收拾了，但爲着要它們不弄下來，我用木條把它們繫緊。那時候是破得的禁戒，他們在家裏虔誠地喫四旬齋——乾筋湯，麥粉，酸麥醬，酸白菜。這一切我都不喜歡。像耗子一樣胆怯地，我偷了母雞的雞蛋來喫，但牠們發潮得味道不好，於是我決定在烟筒裏做個慢爐子，希望在那裏烘烤雞蛋，但早在我完成這個爐子以前，「鬼怪」就把它毀壞了。這是爐子本身自毀的，——我再不相信「鬼怪」的存在了。

鬼怪不見了，惡魔剩下來。牠們邪惡地到處活動：在地窖，在樓頂和在所有的房間裏。牠們把水桶裏的汽水倒出來，把耗子放在醜漬的黃瓜燻煮，把小貓追趕到人們的腳下，牠們偷竊和藏匿各種小物件——小刀，鑰匙，針箍。必須跑遍各房間，問道：

——魔鬼，魔鬼——玩一會，就給回來吧！

這些自製的奇蹟的幻想是乏味，沒意義，沉悶的，它很快就使我厭煩了。只有當祖母敘述時，惡魔才是快意的娛樂。然而她關於一切都能敘述得從她的話裏，直到今天還剩留着永不遺忘的著魔的聲響。她的歌曲和詩詞，保姆的故事底奇蹟喚起了自己創造奇蹟的願望。保姆葉佛根尼懼怕惡魔，不喜歡它們，把它們看作青蛙，耗子一樣的「不潔」，祖父也高興地，甚至感動地敘述神祕的奇蹟，關於他們怎樣捉着惡魔放在水瓶與臉盆裏，怎樣裝鞍着惡魔，騎在它們身上從莫斯科飛到伯列斯琴，並在伊利羅莎頓施彌撒祭，這樣來同地旅行費去了一個鐘頭的時間。

歌曲和故事給了我什麼呢？我已然說過，在故事裏，在歌曲裏，我感到某些幻想的生物，這生物創造一切故事和歌曲的。這生物彷彿不是有力的，可是聰明的，眼光銳利的，勇敢的，頑強的。它以自己的頑強來克服一切。我說——是生物，因為故事的英雄由一個發展到另一個，重複說吧，它們被我形成一個人物，一個形像了。

這生物完全不像我所生活在人羣中的人們。而我年紀越長大，我越銳利和明白地看見了在故事和貪婪的，妒忌的人們底可厭的平凡的生活之間的不同。故事中人是在坐着「飛氈」在空中飛行，穿着「快靴」走路，用靜水和流水起死回生，一夜間把宮院築好。總之，故事在我面前展開對另一種生活的希望之光，在這裏，有齊某種自由的，無畏的力量在活動着，在夢想着較好的生活。不待說，勞動人民的口頭詩歌，——當詩人和工人結合成為一體的那個時候，——這種永生不滅的詩歌——文學藝術的先——很能幫助我熟悉我國豐富語言的美麗的。

在我二十歲時，我問祖父：為什麼把惡魔放在水瓶與盆裏呢？惡魔——不是魚，牠在水裏——是不方便的。如果惡魔是不可看見的，怎麼能捉着它和放在盆裏呢？這一切——是不明白的。可是惡魔故事裏，——是明白的；在那裏坐着毛氈氈，穿着靴子快跑着，——

——人，——祖父微笑着說，然後他清涼，加上一句：——東西。

其後在我頭背狠狠地打了我，並趕我出屋外。那時我已然服務「人間」，曾在靴店裏做了一個時

期的「學徒」。他們醫治我的被滾湯燙傷的手，祖母替我用圍巾包裹着，我忍受着皮膚上難受的癢痛。

我記得——我走到門口，站在院門上。密雨迷曠着遠遠的路。雨多量地，故意地，甚至帶着咆哮，帶着喧嘩傾瀉在地上。我也想要像狼一樣咆哮一下。我把包裹的手伸出在雨點之下。它很快就舒適了皮膚的癢痛和傷口。或許就從那天起，我失掉了對祖父的尊敬和對聖神奇蹟的一切興趣。可是故事的英雄對我仍是更可珍貴的。當我後來專心讀到教徒們的文學——聖人行傳的時候，我就明白，教堂所敘述的奇蹟是借自於古聖人故事的。所以在這裏，正如到處和在所有事物裏一樣，——教徒是盡着健全的，激發理智的勞動人民的創造力量而生活的。

一九三四年

註一：少共真理報的編輯在幾個月內收集了並部分地登載了五百篇以上的民衆故事。全蘇聯的少共先鋒和學童都活躍地參加收集和抄寫工作。

少共真理報把所有印刷好的故事寄給高爾基，並請求他把關於「在童年時民衆歌曲和故事給了他什麼和民衆的創造力在其工作中又有何種意義」的回憶提供給兒童們。

論崗與點

在蘇聯，與自然的原始力鬥爭的科學的有組織的理智是獲得了無限的自由。克復這些自然力，使它們服役於創造平等的無階級社會底偉大的，全世界的事業，理智更果敢地，成功地和明瞭地指出「第二自然」的創造者和組織者的力量，即從第一自然的田地，力量和富藏裏的舊的，無組織的，甚至仇視勞動人類利益的文化上組織起來。結合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意志的理智，使沼澤乾涸，從那裏採取燃料，灌溉乾涸的平原，改變河流，藉水的傾瀉力造成電火；它（理智）鑿開山道，克服永遠積雪的北極地方，藉運河結合大海；它改變社會主義共和國這偉大國家的物質地理，把自然做成對人們更多效果，大量，豐富和方便。許多新的耕種大胆地被輸入我國農業的習慣裏去，它的技術武裝更迅速地成長着，而最主要的是孩子們也成起來了，他們從書籍上，例如悲愁的，幻想的，荒謬的童話，知道我們革命前向過去的一切骯髒和卑鄙的醜惡。

如果我，老人，認為現在是在那種使人們在文化的朝霞上創作凋萎的詩歌，傳說的心情之下寫着，青年們是會發笑的。是的，我正是在這種心情之下寫着，而且我深深地覺得，我還找不到和事實的力量同樣有力的字句，這些事實乃因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工作的非常成功而喚起了內心的愉快和驕傲。

我一切的愉快和驕傲的心情是被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底開鑿喚起了的，我不講它對我國的農業的意義，——這不是我的事情，我拿這個事實是從它的社會文化方面的意義來講。

怎樣回事呢？在運河的建設上，有着幾萬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敵人，頑固的地主，危害社會的份子，破壞我國法律的人們在工作着。幾千這些人爲他們英雄的，不自私的工作而獲得減短刑期，許多人恢復公民權，得到獎金等等。幾千人領得高級工作的資格證書。有經驗的水力工程學者，建設者的肩大幹部被組織起來了，他們從事於莫斯科至伏爾加這運河的工作和其他同類的建築。當這些建設者更增加自己的經驗時，他們又從事建築裏海黑海間的運河的工作。不是誇大，我們有權利說：幾萬人再被教育了。這不是高興的事嗎？

然而這裏而還蘊藏着更大的意義。在這國家的事業裏，在這「誹謗的」人類的物質裏，再清楚不過地顯露了：即指導大眾的體力跟自然作鬥爭的我們壯嚴勇敢的企業，特別容易使人們感到自己的真正使命——佔有自然力量，鎮壓它們的狂妄。我很堅持去注意這種思想，我相信它是值得注意的。被階級國家的環境殘害的人們，——我們今日的歐洲特別明顯地表露出這種環境，——在這環境裏，「人們相處」實在如「豺狼」，——這些人們，他們的精力被從事於「危害社會」，行動中表現着仇視社會，——這些人們被放到那種排除了爲着一塊香麵包的狼鬥的必要的環境裏了。在他們面前展開了自由發展他們的技能的最大可能，他們裏面喚起了向着競爭的自然的和濃厚的傾向。惡徒，官農，盜賊，——

——他們帶着各種程度的意識明白了用不着互相扼着喉嚨才能够生存，明白了這種生活是可戴的，即在這種生活裏人與人間不是仇敵，而是工作同志。他們面前有仇敵，正如狂暴江河的無組織的原動力一樣，如花崗崖，泥濘的沼澤一樣。克服這個仇敵只能藉人類集體的和組織的精力。而人們就在眼前信服了戰勝一切障礙的集體勞動的創造力了。裝配江河，恰如裝配馬匹一樣，都是爲人類而工作。「社會仇敵」當中有許多人明白了他們是爲着一億六千萬人的家庭的富饒和快樂而工作的，對於文學家，容許想像到某些過去的敵人感到自己不是小地主和掠取者，如他們以前所是的一樣，而不過是一切土地的財產和無限的力量底所有者。這樣感覺——比一切民族和世紀的一切英雄們更高更大了。

這是——浪漫主義？未必吧，同志們。我覺得這也就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改變，改造這世界的人們的寫實主義，即基於社會主義的經驗上的寫實的形象的思維。

個人的實例很少能够說服人的，然而我仍然認爲有極地想起，我是個直接體驗了身體勞動之有益的和高尚的快樂的人，雖然它對於寄生蟲，對於勞動和休息的愉快底兇手，對於一切愉快生活的兇手是無意思的沉重的的工作。做得好——就是生活得好。這個簡單，明白的真理是千萬同志——地球上第一個建設社會主義者——所深知的。這個堅實地結合着理論和實踐，倫理學和美學的真理必須作爲我們的兒童教育基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這些父親，他們有這樣美麗的始創的權利在兒童面前顯做自己勞動的偉大，像蘇聯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爲自己始創和鞏固了這種權利的一樣。

資本主義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底基本不同，正在於我們有主導的觀念和一切經濟實踐，一方面壓決地排斥了人榨取人，同時不倦地和成功地把人們培養成爲自然精力的有理智的開拓者。

資本主義是靠著人的榨取而存在的，它開拓天然力量多少，就是天然力量幫助兩腿的榨取者剝削工人多少，使工人作爲製造者和消費者，使剝削柔弱的智識的人道主義者在不斷的社會鬥爭中作爲調停者，剝削寄生蟲的小布爾喬亞作爲自己的後備隊，總之，對於資本主義，人是有點命定地自滿於專好牟利的癡愚，鞏固和糾正黃金政權的狂妄，對這政權，伊里奇列甯早已給它預定用作建築公共廁所的物質了。

我重複着不只一次所說過的話吧：在過去，甚至在最努力的時代，例如在文藝復興時代，任何地方，天才的數量都沒有這樣迅速，這樣豐富地增長着，像我們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時期中所有的一樣。我們的天才們的基本傾向就是根本上改變他們的一切生活環境，建築新世界的果敢的傾向。我們知道這些是句子，單字，但我們不大知道這是我們的事業，——因爲我們沒有一個機關清楚地系統地給我們指出我們在農業，技術，科學，發明，農業文化的發展，大眾理智力的成長這一切部門裏的成就的準確總和。我們在科學和技術裏的成就最成功地清楚地表現出來了。人們常常因我在科學和技術的人員面前低頭俯服而譏笑我，有人現在還繼續着從事於這種對我不傷情感的譏笑，而無知者却相反地和社會的地從事於惡意的嘲弄。在這些嘲笑裏暗藏着卑鄙的舊殘餘，即是：無知者的懷疑主義，小市民

的懷疑主義。

然而在現代，再沒有什麼比蘇聯個人和大衆的智力成長的有成效的一般畫像更有成效的了。這畫像使我必得承認科學和技術的工作人員是我們實際的真英雄。我不獨注意他們各種工作的深奧的文化革命的意義，——這裏沒有篇幅來論列它。然而我要講幾句話關於我們的學者和工程師，像關於社會典型一樣。這真正是新人。新的，不單因為他堅決地棄却布爾喬亞學者專家們「爲科學而科學」的口號，「嚴肅的真理」的探求者的口號，——我們的青年學者知道，永遠的真理是沒有的，每個真理不過是認識的工具，向前和更高的階梯。他是新人，因為和所有其他的文化技師不同，他是在實踐上改變世界的直接的活動家，他是普羅列塔利亞的「選手」，工人大衆的蘊藏的，「潛勢的」天才的指示者，他把這天才顯露出來。尤其是對於他的有價值的特性，必須認識他所發展的責任感，——在我看來是真的社會主義感。——在他用以工作的材料面前，在他所參與的技術過程面前，在集團——在其中顯出他自己的才能——的面前，在黨和階級——在那裏他不是雇人，而是階級的創造個體的一員——的面前，他認識自己的責任。他是工人集團的必要的，有時主要的一部分，——他聯結和凝固着勞動過程中的集體精力。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深重的責任。

科學工作人員與工程師和大衆中其他文化技師和先導者如舞台藝術家，文學家比較起來是不如藝

115

的，不無憂慮的。作家和藝術家較爲接近地熟悉社會，他們比科學和技術工作人員更多享受社會和

體的注意，同情，關懷。技術和科學技師的勞動還沒有像獲得盛名的文學家的勞動一樣得到高的報酬，這勞動不是歸關於醫生，衛兵和戰士保護人們的健康勞動，關於教師們使兒童離開黑暗觀看他們周圍的世界的勞動。

很有根據來堅信，文學家所有的社會的責任應該比較其他的文化技師發展得更薄弱。甚至可以提出這問題：作家在讀者，時代，社會的面前感到自己的責任呢，抑或只在批評家面前感到呢？你常常看到，我們的文學家不大懂得責任，否則就在材料面前完全不懂得責任。文學家個人主義的溫度比其他文化技師的更高得多。據說，這是由於工作的性質，——我不想對這類的解釋有多少分是對的。工程師和學者的個人主義被他們的專門事業註解了：天文學者，天體物理學者不必懂地質學，醫學；船舶或橋樑的建築者或者可以不懂人種學或動物學。

文學家必須知道，如果不全部地，也須盡可能地多知道關於天文學家和鐵匠，生物學者和裁縫，工程師和修人等等。講到吳越，說它是紅色的或赤色的，是講得不充分的，像我們的文藝家通常關到普羅列塔利亞的敵人一樣地不充分。作家們是很知道和明白一些舊格言的：「你是帝王，——獨自個兒生活吧」。這小格言是不確實的。帝王是被許多各式各樣的僕婢圍繞着的，文學的男爵們模仿帝王，也企圖替自己設置某些僕婢。他們沒有從作家的習慣裏把另一舊格言「為藝術而藝術」抹除去，而某些名匠却企圖製作上品的文學，就模仿別人，例如，模仿杜斯巴梳斯（D. S. Dobson）（美國作家）

——譯註——諷刺皮涅克的失敗的漫畫，他本身就够諷刺的了。大家仍辯着關於形式與內容之間似乎存在着矛盾，彷彿某種失掉內容的形式是可能的似的。例如，用空氣做成的大砲，——雖然空氣也是一種物質——不是用現在的軍用砲彈射擊的大砲。物質的社會意識越發展，那麼它要求的形式就越趨於正確，準確和明白，——我覺得，這老早就該明白的了。

很多文學家絕少關心到怎樣才使他們的作品思想和筆調比較地易於使讀者理解，——這倒象是復地指出來了，但完全無效。即使不是有名的文學家說：「同志，須知道東西這是一樣——」——像武生氣，到處發牢騷，而且證明這文學家是個天才的文章也出現了。有人覺得，如果「過去這樣」，那麼「的確」將來也必這樣」，他們非常願意痛罵過去的敵讎，而且在現在還我出着干它們殘餘的時候，就不無高興地強調昨日和今日的類似。意氣相投的小團體建立出來了，它們非難那些反對小團體的人們，對於他們，最後一種人，「文學報」也答覆了並把這無恥的混亂稱為「文學生活」。因為真理是從「矛盾」的對照中被認識的，——我當然在那種場合裏——即當每個團體於在同一類經驗的影響下建立起來，不是要命令，統治別人，而是對別人堅持着自己的經驗堆積的相反意見，並且忠誠地做出來。真求達到某一個最高意識形態的一致，承認必要的文學家同盟——在這場合裏是不反對小團體的。

117
人們說：「因為健康才開始，因為死亡才完結。」這是最壞的，但仍不是完全的，因為文學是一種事業，而在我國，在我們的環境裏——甚至是偉大的事業。於是生活力是這樣的，我就相信着：死

者可以復活的。

親愛的同志們！你們是生活在大眾的集體勞動的氛圍裏，這大眾正在改變地球的物體地理；你們是生活在和自然作空前的，驚人的果敢的和成功的原始的鬥爭底氛圍裏，是生活在這樣的氛圍裏，這氛圍把惡徒們，普羅列塔利亞的敵人，頑固的地主，「危害社會份子」再教育成爲有用的，積極的公民，也許，同志們，對於你們再受教育成爲自己事業的真正技師，成了爲着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的自由和幸福而工作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積極同伴的時候已經來到了吧！

有短見和觀點。這需要區別。顯然，崗——是沼澤的特殊，它被放在乾土的位置上面。從崗的高處，你看不到許多的。觀點就有點不同：它是由於文學家觀察，比較，研究各種生活現象的結果而被構成的。文學家的社會經驗越廣闊，他的觀點就越高卓，他的智識的眼界就更闊大，在地球上接觸的事物和這些接近的，相關的協同動作對他就更明白。科學的社會主義給我們創造了最高的智慧高層，從這個高層上面很清晰地看見過去，並且指出一條直接的唯一的到未來去的道路，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道路。被政治天才列甫所創造的工人政黨的成功的行進，說服了全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甚至說服了和普羅列塔利亞毫無關係的健全思想的人們，即是從「必然的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道路——不是幻想的。被稱爲「法西斯蒂」的布爾喬亞臨死的痙攣，特別是德國布爾喬亞的可怕的苦痛，更確

信地說：普羅列塔利亞的路是正確的。黨的舵手，約瑟夫斯大林的鐵的意志，卓越地把持着不使直接行程趨於偏斜，並且迅速地醫治黨的船的指揮官各種的「眩暈」。除這一切外，必須補充說，「歷史爲着我們而工作」是更決定的和順利的。

這是樂觀主義？不。必須看清一切卑鄙和醜惡，它們從外面脅迫着我們——在人類歷史裏第一個國家，這國家是普羅專政基於科學的社會主義建築的。必須無情地和冷酷地反對對普羅列塔利亞的基本目標仇視的和胆敢阻止它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的成長的一切。必須很好地知道，雖然在某些國家裏普羅列塔利亞的活動被阻滯了，可是仍然沒有力量能夠停止它的。我們的大衆政治教育的體系就是真理的教育體系，反對這體系，資本主義只能提取武器的力量，可是武器却操在普羅列塔利亞的手裏。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可恥的褻奪公民權——是懦弱者被革命真理的成長所驚嚇了的自殺。

對於白海波羅的海之間的運河，波爾什夫斯克和其他這類殖民地的有教育意識的經驗的例子，我們文學家們必須明白，我們的真理的教育體系給與怎樣輝煌的結果，這唯一真正的革命真理的力量是多麼的偉大。然而這主題，我要在別的文章裏寫，而現在再回到文學上去。對於我們的作家們，必須在生活上和創作上站在觀點上面，從它的高處——只有從它的高處——才清楚地看見資本主義的一切醜惡的罪惡，它的血腥企圖的一切卑鄙，才看見普羅列塔利亞專政的一切英雄的工作的偉大。只有從職業的，行會的，生計的蜘蛛巢裏解放出來，才能够躍起在這觀點之上，在這蜘蛛巢裏我們會靜悄悄地

纏繞着自己的，也許沒有注意這個吧。必須明白，生計可以使我們變為勞動階級寄生蟲，變為那些社會的笑柄，這些是布爾喬亞的大多數作家們常常做的。

迫使我怎樣講的焦慮，不獨是我體驗到，而且尼古拉齊項涅夫，我們一個最有天才的文學家，論「冷淡」一文的作者，也知道這焦慮。在跟最敏感的文學青年作友誼的會談中也感到這種焦慮，——文學青年是誠懇地活潑地懸念着文學的命運和明白它的文化教育的意義的。這焦慮乃由於文學家們對他們全蘇大會組織上的工作的冷淡態度。有這個問題：在省和共和國一百個青年作家代表面前，中心的文學是以什麼表現呢？他們將和青年講什麼呢？可能期待出的：就是從前的蘇聯作家協會再次公開表示自己的錯誤，雖然是在懺悔，他們過去的敵人，朋友和志同道合者却再次回報他們以嚴厲的批評，這批評教不出什麼來，却完全能夠喚起一大堆的希望，使某些虛構者更加不負責任。

不久以前，近日來，一個問題在組織委員會會員面前被提出來：他們對於籌備全蘇大會，做了什麼呢？他們不能給予明晰的答覆，雖然這問題是有關他們「切身的」事業的。

他們的才幹發出冗長而暗晦的聲辭，暴露出思想的顯明的少血，貧血。他們當中有些人昂然也走過喜愛惡劣氣候的談天者們的身旁，顯然確信他們會在一切環境裏成為英雄的。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感到無暇參與白海、波羅的海之間的運河的建築而表示遺憾；沒有誰知道最巨大的水陸學者和水電學者，工程師安得舍洛奧美加奧在索加夫加西，在加夫加西，在中亞細亞，在西伯利亞兩年來工作的結果

；沒有誰對於在任何情勢裏創立巨大的實驗室學院的事業感到興趣；總之，新文化建設的進行，顯然是在他們的注意範圍以外，而如果他們熟悉這些，只不過是從報紙上知道，這却就是美術文學的很少營養的食品。你看現在莫斯科附近建築一些供伏爾加、莫斯科運河工程幾千工人的宿舍，這幾千個各式各樣的大們——是作為研究的最好的材料。我不相信，「執筆朋友」當中有誰注意這最豐富的材料。

我沒有忘記，我們年青的文學在十五年内給與了幾千本很有價值的和天才的書籍。但我也沒有忘記，在這些書裏面所處理的主題，數目很少；有許多主題，被迅速地採用了，處理得很表面的，——給委屈了，就是說，給毀壞了。

不能不特別注意，我們的文學家，差不多只除了奧克尼夫外，都沒有寫出一本——專給父母的——關於兒童的有價值的讀物。我已經不說關於寫兒童書顯明被認為減低「高的藝術」的價值的了。工廠裏農民的變質的主題，人從少數民族變成共產國際主義者的智識的和情感的同化的主題，都沒有觸到；沒有寫出一個女行政員的清晰的畫像，沒有寫出科學工作人員，發明家，藝術家的畫像，——這些人們的畫像，他們有些是生長在我們的僻鄉，在城市的僻小小巷裏；他們和無相笑的牙合的隱晦的小人，或和城市空地上的叫化子、小賊一同受教育。而這些人們當中有許多大天才已經聞名於歐洲了。我們在本國却不知道他們，即使知道了——也忘掉了他們。

文學家眼光的睜光是窄狹的，狹窄的，而這種小的原因——就是短見。所有地方的百曉和藝術家

普羅列塔利亞期待着我們鮮明的，熱情的字句，期待着被大眾和個體所完成的偉大的成功的工作底質。明的描摹，它們裏面凝結着大眾的奇蹟的精力。不論全世界布爾喬亞的報紙怎樣誹謗中傷，不論它們怎樣熱心地虛構一切可能的醜惡，不論極端保守派議員怎樣說謊，企圖非難我們的工作，但是這些報紙已經不能不承認我們的建設的成功，我們的外交的成功。而在領土上最爲接近我們的歐洲的普羅列塔利亞，現在更常常從自己敵人的口傳裏，從布爾喬亞的口傳裏聽到他們承認「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的偉大成功。

蘇聯的文學家們必須增廣自己的眼界，爲的是擴大和加深自己的活動。被聯邦的普羅列塔利亞所創造的時代，新歷史，要求他們這個，兒童要求這個，這些兒童很快就成爲少年，那時候他們可以在父親面前提出一串串破壞的問題了。最後，藝術要求他們這個。

境外和境內的敵人們，高興就請說吧：「高爾基給我們一點適口的『精神食糧』！這將是錯誤的愉快。我是不想餵養豬羶的。文章被蘇維埃聯邦的現實的高價喚起了。普羅列塔利亞的敵人根本上無能理解這些價值的高度和意義。蘇聯文學很好地成長着，然而現實是偉大和美麗的。必要使文學達到真實的高度。就是這樣。」

後記

收集在這裏的十三篇譯文，是根據一九三五年蘇聯「國家圖書出版局」印行的高爾基「文學論」一書中譯出的。除了一兩篇是舊譯外，其餘都是這一年來譯出，而且大都已在各刊物上發表過。現在承「文獻出版社」願把它們集印單行本，命名「文學散論」。

原書「文學論」是高爾基一九二八年至三三年間所寫的論文集。它包括着文學的各種基本問題。從這論文集裏，我們可以看到高爾基對文藝各種問題的意見和主張。

「文學論」全書包括論文和演講共三十八篇。它雖還沒有全部譯成中文，但也已經有了許多選譯。除這裏的十三篇外，其餘大部分已有人或根據原文，或根據英日文譯出，雖然有些還是節譯的。據譯者所知，它們大都是在魯迅所編印的「海上述林」中和楊伍所編的「高爾基文學論文集」中。

譯者力求忠實原文，但因爲學力和時間所限，謬誤之處，勢必難免的。希望讀者諸君指正！本書得以集印，察似兄給予很大的助力，謹此誌謝！

野草叢書

此時此地集

夏衍著 每冊七角

夏衍先生的評論，簡潔扼要，自成一格，早獲社會人士好評，富熱情，少誇張，且風格清新。此集為作者自選之散文雜文集，共二十四篇，均最近一年所作。

感覺的音響

秦似著 壹元四角

本書共分四輯：第一輯為隨感；第二輯關於婦女；第三輯關於歷史；第四輯關於時事。作者雖不誇飾，然其筆力雄健，氣度不凡，且能直抒胸臆，不假修飾。其文多具思想性，可供讀者思考。或一參考也。

歷史的奧秘

紺弩著 壹元四角

本書乃作者四年來所作雜文之結晶。長短共三十餘篇，計五萬言。作者于文學各部門，涉獵至廣，而尤以雜文見稱，蓋筆墨淋漓，主張具體，學識淵博，有以至也。凡愛好文藝者，不能不手此一編。

- 高崇的憂鬱……林林著 (壹元四角)
- 蛇與塔……紺弩著 (壹元五角)
- 胃腸集……何家槐著 (二元六角)
- 過客……司馬文森著 (二元六角)
- 長夜集……孟超著 (二元二角)

文獻出版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翻譯叢書之二

文 學 散 論

每冊實價國幣二元
外埠加郵匯費

著	譯	發	發	印
者	者	行	行	刷
者	者	人	者	者
高	孟	夏	文	國
爾	昌	雪	獻	光
基		清	出	印
			版	刷
			社	廠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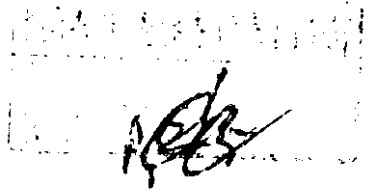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出版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〇六四號



1.2
1-58



\$2.00

1
30